

緒論

本論文題為「從文學團體探討《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映現的日常生活主題」，將以布爾加科夫作品《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文學團體「莫文聯」為主要研究對象。文中探究團體特殊的思想與行為、「住房問題」及權力與空間的關係，試圖從中了解布氏自身經歷與當代社會的關係。論文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為緒論，第二部份為主文，共有三章：第一章敘述俄國 1920、30 年代的社會背景與布爾加科夫的生活；第二章探究文學團體在俄國的發展、「莫文聯」的特殊行為及團體與大師的衝突；第三章陳述當時的住房現象並分析私領域及空間與權力的關係。第三部份結論則針對主文之分析做總結。

「緒論」共分四節，第一節說明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提出研究途徑與方法，將分別介紹進行研究時所使用的具體方法。第三節了解現今的研究概況。而第四節則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框架與各章主要內容。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學雖為虛構，卻又反映「真實」，作品內容除了人與生俱來的喜怒哀樂等情緒外，也包含其日常生活形式，作家可能描寫具有時代背景或是反映某個時代與階級的生活型態，這類的作品包含：普希金（А.С. Пушкин）的《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描寫 1820 年代貴族生活、《射擊》（*Выстрел*）中軍官用決鬥（*дуэль*）來決定勝負、《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以當時軍官盛行的撲克牌遊戲為背景描述故事。另外，萊蒙托夫（М. Ю. Лермонтов）在《當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中呈現高加索地區山民及貴族的生活。果戈里（Н. В. Гоголь）的《舊式地主》（*Старосветские помещики*）則描述烏克蘭地主的生活細節。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的《獵人日記》（*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通過獵人的眼光描述地主壓迫與剝削農民及農民的生活。托爾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的

《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描寫上流社會的生活及遊戲規則、《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在俄國與拿破崙的戰爭背景下寫出貴族社會及戰爭的生活樣貌；此外，日常生活的描繪可能傳達人的心境，如杜斯妥也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的《罪與罰》(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中，以主角拉斯科尼科夫(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狹小如棺材的房間帶出他內心潛藏的殺人動機、契訶夫(А. П. Чехов) 的《第六號病室》(Палата № 6) 做為病人的生活與心情及納博科夫(В. В. Набоков) 的《斬首之邀》(Приглашение на казнь) 在荒誕的劇情下，主角做為罪犯在獄中的生活與心境。上述例證顯示「日常生活」不論在何種創作主題及方式下皆佔有一席之地，甚至成為主要的描寫對象。

二十世紀著名俄國作家布爾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 之創作以魔幻色彩和諷刺筆法見長。誠如歐茵西教授所言：「布爾加科夫擅長將奇幻性的人物和情節調和入現實生活中，使之變形，將讀者帶進充滿離奇色彩的神秘世界裡，這些離奇與神秘，喻意深遠，是作者對現實的諷刺。」¹《不祥的蛋》(Роковые яйца)、《狗心》(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 及文壇巨作《大師與瑪格麗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等皆屬於幻想與現實交錯發展的作品。

布爾加科夫擅用怪誕及諷刺加上奇幻的手法以反映社會現實，在《不祥的蛋》故事中紅外線將雞蛋變成駝鳥蛋、鱷魚蛋和蟒蛇蛋，不久大量駝鳥、鱷魚和蟒蛇到處行走並進攻莫斯科，直到冬天這些動物進入了冬眠才全數被殲滅。而《狗心》描述一位醫生把主要器官移植到狗身上，牠快速適應了蘇聯社會的惡劣行徑，最後醫生又將它變回狗。表面上看來，這兩部小說都在描寫科技對人們生活帶來的衝擊與危害，實際上作家藉著幻想題材，反映當時蘇聯社會，以表述自己的立場。

布爾加科夫最重要的一部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從 1928 年開始創作，歷經了十二年，期間有八次重大修改，甚至有兩次幾乎重寫，小說直到作家去世後才出版

¹ 歐茵西，《俄羅斯文學風貌》。台北：書林，2007，頁 256。

問世。為何布爾加科夫對《大師與瑪格麗特》進行如此多次的刪減及修改？妨礙他成書的內外因素為何？作為一部文學經典，《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呈現的善惡觀、宗教哲學思想、不潔之力主題已成為眾多研究探討的對象。該小說具複雜的時空結構，兩千年前的耶路撒冷和 1930 年代的莫斯科同時存在於文本之中，作家用「魔幻寫實」手法，讓撒旦沃蘭德（Воланд）及他的「黨羽」出沒至莫斯科的劇院與街道，並向讀者展示當時發生在首都的社會現象。文學創作、文學團體、住房問題推動莫斯科情節線發展，也決定小說人物的行動及命運。從《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可以看出，文學團體和住房與創作者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因此，本論文將以此範疇作為研究重點。

在俄文當中，「обыденность」、「быт」、「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都有「日常生活」的意思。何謂日常生活？其定義眾說紛紜，社會學者將日常生活定義為「日常存在的一般事物」（обычное ежедневн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或是「生活方式及類型」（род / образ жизни），社會學家對於日常生活的研究主要是「滿足人類物質生活與精神需求」及「人的社會化過程」。在歷史人類學（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方面，主要以人類學概念，研究人的心理與物質生活；至於民族學（этнография）則著重日常生活方式。另外政治學（политология）研究的對象則是政治社會的背景中，選民的生活習慣²。

文學及文化領域中的日常生活概念，其定義與研究方向也各有差異，學者別洛文斯基（Л. В. Беловинский）在《俄羅斯日常生活文化》（*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ой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中寫道：社會生活由個體及社會之經驗所產生，在這樣的社會生活中，存在既有的及新產生的社會生活規範及標準，於此標準下所發生的實際過程稱為日常生活³。他還提出

² 參考網路資料：Орлов Б.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1-229.

http://www.hse.ru/data/261/449/1233/1%D0%9E%D1%80%D0%BB%D0%BE%D0%B2_%D0%98%D0%91%D0%A1%D0%BE%D0%B2%D0%B5%D1%82%D1%81%D0%BA%D0%B0%D1%8F%20%D0%BF%D0%BE%D0%B2%D1%81%D0%B5%D0%B4%D0%BD%D0%B5%D0%B2%D0%BD%D0%BE%D1%81%D1%82%D1%8C.doc（資料擷取時間：2010.05.06）

³ 此概念引自：Беловинский В.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ой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М.: Высш. шк., 2008. с. 4.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的同義詞：「обыденность」及「быт」的概念，他認為「обыденность」是日常生活較為狹義的定義，而日常生活中所要探討的重要部份是「быт」，並從個人、家庭、社會及官方四個層面來研究。奧洛夫（И. Б. Орлов）則將日常生活定義為人的周遭所發生的事情，包括其生活習慣、生活環境、文化背景及使用的文字語言等等⁴。除此之外，安提皮娜（В. А. Антипина）在《1930-50年代蘇聯作家之日常生活》（*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1930-50-е годы*）一書中，將日常生活解釋為個體為滿足生理、心理及社會的需求與對外在條件進行改變所做的努力⁵。

「日常生活」（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早已成為學科中的研究議題，例如社會學（социология）與人類學（антропология）能透過日常生活的探討了解人們的生活情況及人類的演化等等。而作為文學及文化的研究議題始於 20 世紀，早在 20 世紀上半葉，形式主義論者提尼亞諾夫（Ю. Н. Тынянов）的《文學現實》（*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факт*）針對所謂「日常生活」（быт）做解釋，另一位形式主義代表人艾亨鮑姆（Б. М. Эйхенбаум）也發表《文學生活》（*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быт*），兩人均認為所謂日常生活範疇對於文學演進具有一定影響力。另外，俄國符號學家洛特曼（Ю. М. Лотман）在《十八世紀俄羅斯文化日常生活行為詩學》（*The Poetics of Everyday Behavior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Culture*）中提出日常生活的相關概念，也以十二月黨人為研究對象寫出《十二月黨人的日常生活（歷史心理範疇的日常行為）》（*The Decembrist in Daily Life (Everyday Behavior as a Historical-Psychological Category)*）。諸多文章發表顯示「日常生活」研究已日漸受重視，成為現今文學及文化中常見的研究面向。

筆者認為，《大師與瑪格麗特》的兩個重要主題——「文學團體」及「住房問題」——充份映現作家同時代的社會生活現實，本文將以這兩大主題為研究對象，試以歷史及文化的角度，自布爾加科夫所處之時代背景出發，根據《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出現的

⁴ Орлов И. Б.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 9.

⁵ 參考：Антипина В. А.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1930-50-е годы*.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5. с. 8.

「莫文聯」及爭取「莫文聯」主席住房的現象，分析蘇聯時期的文學團體與住房問題。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包括：

- 一、 探討 1920 至 30 年代蘇聯時代背景、社會現象及作者生活情況。
- 二、 以《大師與瑪格麗特》為研究對象，探討俄國文學團體出現之背景與原因及其對作家生活之影響。

文學團體由許多世界觀，創作理念、方法相近的藝文界人士共同組成，對於文藝思潮之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十九世紀初俄國浪漫主義的形成，就與以普希金參與過的「阿札瑪斯」（Арзамас）、「綠燈」（Зелёная лампа）等團體息息相關；1830 年代以史坦凱維奇（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танкович）為首的文學團體，成為阿克薩科（К. С. Аксаков）、別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巴枯寧（М. А. Бакунин）等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和西化派（Западники）知識份子論戰的場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各種團體、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則成就了俄羅斯文化的「文藝復興」時期——白銀時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然而，到了 1920 年代中期，為強化官方意識型態，杜絕文學團體所帶來的自由論述，蘇聯政府下令停止一切自發性的文學集會活動。1934 年更成立「蘇聯作家協會」（С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將文學創作變成「社會訂製」（социальный заказ）。如此一來，官辦的文學團體主宰文學生態，控制文人日常生活。

上述現象被布爾加科夫寫入《大師與瑪格麗特》之中，因此，本論文將以該文本為研究基礎，探討作家協會出現的背景，論述擁有真正創作才華的大師為何被關進精神病院，而遵循主流意識的無神論者，卻得以在「格里鮑耶陀夫之家」（Дом Грибоедова）

享受特權。

三、 根據《大師與瑪格麗特》提及之住房問題，探討蘇聯住房制度之實施與影響。在文本中白遼士（Берлиоз）去世後，他曾住過的公寓頓時成為搶手貨，無論文聯成員，或者往生者的家屬，莫不覬覦。而格里鮑耶陀夫之家各單位中，以管理住房的辦公室前最常見排隊之人。為何住房問題成為三〇年代上至文人，下至庶民最關心的日常生活問題？布爾加科夫在小說中以詼諧的筆法，生動描繪眾人爭取居住權而表現之行為舉止，這樣的文字底下，又隱藏何種潛台詞（подтекст）？本論文將藉《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提及的住房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企圖找出文本與時代之關聯。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大師與瑪格麗特》中與上世代蘇聯二、三〇年代日常生活相關的兩大主題——「文學團體」與「住房問題」，涵蓋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層面。在研究途徑方面，筆者選擇奧爾洛夫（Орлов Б.）的「微觀歷史」（Микроистория）概念、俄國文化符號學者洛特曼（Ю. М. Лотман）的日常生活行為詩學概念，以及盧卡奇（George Lukacs）、郭德曼（Lucien Goldmann）的文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Literature）概念，藉由奧爾洛夫、洛特曼、盧卡奇和郭德曼等人的觀點及論述從社會及歷史文化二方面著手，深入探討小說內容。研究方法方面，筆者採用文本分析與傳記分析，試圖了解作品中反映的蘇聯時期二、三〇年代樣貌。

壹、研究途徑

一、歷史學研究途徑

文學文本的歷史背景研究，可從「宏觀歷史」（Макроистория）與「微觀歷史」（Микроистория）兩個角度出發。根據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說法，「宏觀歷史」研究不同國家與社會在不同時間下的差異。而「微觀歷史」則著重於特定空間與時間中的個體與獨立團體做深入的探討。本論文將以「微觀歷史」作為主要研究途徑之一。

「微觀歷史」概念在歷史沿革中有不同定義詮釋，正如奧爾洛夫（Орлов Б.）認為，「微觀歷史」已成為目前傳記歷史與日常生活研究的重要方法。⁶這個概念源自 1950

⁶ 此概念引自：Жураев С. *Иностранцы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1920-1930-е гг. Источники и методы социа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ис. на соиск. Учен. Степ. Докт. Ист. Наук. М., 2000. С. 258.

年代，當時被定義為「短暫事件的歷史」(история эфемерных событий)⁷，或「在被壓縮的時間中出現的歷史事件」(история событий, заключенных в сжатых пределах времени)⁸。1970年代，「微觀歷史」的議題再度為義大利歷史學家提出，並且將其運用在研究與法國傳統相關的研究上。到了1990年代，義大利學派的「微觀歷史」存在兩種不同研究方向，一種偏向社會研究，另一種則為文化研究，兩者在方法與目的上稍有不同。⁹

本論文採用奧爾洛夫對「微觀歷史」的解釋，將「微型歷史」界定為研究典型社會基本階層的歷史¹⁰，作者透過作品與讀者產生連結，試圖在作品中表現具體的社會事實或歷史現象。筆者借用奧爾洛夫的說法，探討1920-1930年代的蘇聯社會現實對於「文學團體」的影響，及「文學團體」進一步衍伸的日常生活問題，試圖找出歷史與研究對象的密切關係。

二、日常生活行為詩學研究途徑

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之中，文學團體從一文化現象成為文學描寫對象，它所反映的不只是作品情節或人物性格，而具有更深層的歷史意義。

塔爾圖－莫斯科學派(Тартуско-московская школа)主要代表洛特曼在〈18世紀俄羅斯文化日常生活行為詩學〉及〈十二月黨人的日常生活(歷史心理範疇的日常行為)〉中提出：每一個個體的日常生活行為(包括語言、反應動作及服裝)皆按照其社會地位

⁷ 參考網路資料：Орлов Б. *Микроистория: «атомизац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или её иной образ?* с. 2.

<http://www.hse.ru/data/2010/03/13/1231126164/%D0%9C%D0%B8%D0%BA%D1%80%D0%BE%D0%B8%D1%81%D1%82%D0%BE%D1%80%D0%B8%D1%8E.pdf> (資料擷取時間：2010.06.18)

⁸ 同上註，頁2。

⁹ 參考網路資料：Черутти С. *Микроистория: соци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культурных моделей?* с. 1.

<http://orbis-medievalisru.47.com/ru/library/cerutti.pdf> (資料擷取時間：2010.06.19)

¹⁰ 同註7，頁5。

來運作，其行為必須符合當時社會的觀感與標準；個體在不同場合及團體中有不同的角色，其行為模式也不同；個體的行為趨於理想化，日常生活成為一種舞台，個體的行為反應成為一種情節，而個體則成為舞台上的角色。

因此，本論文將以「莫文聯」為 1930 年代文學團體的縮影，從人物於日常生活中表現之行為探究文學創作者的社會心理，進一步探究由文聯衍生出的住房問題。

三、文學社會學研究途徑

「文學社會學的特點，在於建立並描述社會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¹¹ 社會先於文學作品，作家受到社會的影響，反映並描寫社會，或是力圖改造社會；社會又在文學作品之中，從作品中可看到社會的影子。文學社會學的概念早在 19 世紀已經有了基本原則，其基本概念為作家的對象——人，人與社會生活、社會的鬥爭和社會政治不可分割。在文學社會學理論當中，盧卡奇及郭德曼兩人的論點與本論文所要探討的主題相關。

（一）盧卡奇的文學社會學概念

喬治·盧卡奇（George Lukacs）在 20 世紀對於文學社會學具有領導地位，他在《小說理論》（*Die theorie des romans*）¹²中提出文學與歷史密切相關，因為文學形式及內容，都有其相對應的歷史階段，而小說中潛藏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過去，以及某一民族的生活樣貌。

另外盧卡奇也認為，作家除了藉文學作品體現社會現象，也藉由文學作品表達使命。「小說不僅有深思熟慮的命題，內容也反映了時代。」¹³ 盧卡奇對於「世界觀」

¹¹ 塔迪著，史忠義譯，《20 世紀的文學批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頁 174。

¹² 此部作品寫於 1914-1915 年，1920 年發表於柏林，1963 年譯成法文。盧卡奇借用黑格爾「美學類型的歷史美學」觀點，以此為基礎，創立了文學體裁的辯證法，這一辯證法與社會密切相關。

¹³ 塔迪著，史忠義譯，《20 世紀的文學批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頁 178。

方面，提到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並非按照作者個人描繪，而是反映社會現實發展出來，這樣的說法進一步延伸出作家個人「世界觀」的問題。盧氏對於「世界觀」的解釋：作家的思想構成世界觀的表面；世界觀的深層結構包含「時代的重大問題和人民的痛苦」。¹⁴對於盧卡奇來說，作家的價值在於抓住時代的問題並再現社會現實。

（二）郭德曼的文學社會學概念

呂西安·郭德曼（Lucien Goldman）的文學社會學概念針對「世界觀」方面與盧卡奇有不同的解釋：世界觀並非孤立的個人現象，而是社會現象。「世界觀並非是個體不斷變化的觀點，而是處於相同經濟和社會條件下的一個團體的思想體系。」¹⁵世界觀的概念在郭德曼的解釋下，成為一個整體的現實、一種統一的想法。與盧卡奇想法不同的地方在於，郭德曼認為不能透過作家的連接來看作品，而是需要理解作品本身的意義，將作品中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連結起來。他進一步說明「作家並非照搬現實，而是創作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物，一個具有一定結構的藝術世界，其價值在於作品的豐富多彩與完整統一。」¹⁶因此，郭德曼一再強調文學創作的真正主題是社會團體而非獨立的個人，社會團體中出現的個人，無法跳脫社會團體的共同性。

盧卡奇所持的觀點認為文學作品並非出自作者幻想或捏造，在作品中隱含歷史及作者的「世界觀」，作品透過作者的描寫反映社會現實。布爾加科夫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描寫「莫文聯」（文學團體）及「住房問題」並非毫無意義，關於兩大主題的人物與情節，扮演了反映社會現實的角色。

而郭德曼將「世界觀」看作團體的思想體系，要理解文學作品必須經由其中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因素。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莫文聯」為一文學團體，因時代

¹⁴ 塔迪著，史忠義譯，《20世紀的文學批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頁179。

¹⁵ 同上註，頁184。

¹⁶ 同註14，頁186。

而產生，具有歷史與文化意義，並反映當時社會。根據盧卡奇與郭德曼兩人的論點，本論文將以《大師與瑪格麗特》「莫文聯」（文學團體）與「住房問題」為研究對象，除了探究其背後的歷史、政治及文化因素外，也試圖了解兩大主題衍生出的身分與特權問題。

貳、 研究方法

一、文本分析

在使用文本分析時觀察文本中的情節、對話、物品、人物動作行為及內心描述等，對於作品中具體的景象、佈景及室內陳設探究其象徵意義。人物方面，從情節及佈局方面著手，對於角色的作用及其行為與心理進行分析，進一步了解作品的中心思想。

二、傳記分析

作品間接反映作者的想法、生活與境遇。作家的出身、生長過程與生活環境影響了作家對於作品的態度及作品的創作手法。因此在進行分析時，採用傳記分析法，透過自傳、傳記性質著作、他人評論及回憶錄等，了解作者創作作品之背景及其反映在作品中的想法。

三、歷史文化語境分析

文學作品中描寫的現象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現實生活，因此除了文本與傳記分析外，歷史文化語境也為一項重要的分析方式。藉由了解作品中反映的時代，收集相關的歷史與文化資料，搭配文本中的情節與對話，探究作品符合的歷史現象與社會現實，並進一步研究現象的成因與對社會帶來的影響。

第三節 文獻回顧

現今研究布爾加科夫作品的學術著作甚多，其中又以《大師與瑪格麗特》最受重視，其小說類型、中心思想、作品的音樂象徵與角色分析，以及善惡觀、宗教意識、不潔之力等，皆為研究的主題。

在俄文研究專書方面，阿布拉胥金（А. А. Абрашкин）與瑪卡洛娃（Г. Б. Макарова）所作之《〈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書寫密碼》（*Тайнопись «Мастера и Маргариты»*）針對作品文字中隱含的意義作探討，包括書中出現之角色的原型為何、書中的哲學思想等等；庫拉耶夫（А. Д. Кураев）的《〈大師與瑪格麗特〉：贊成或反對基督？》（*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за Христа или против?*）探討布爾加科夫的宗教意識及《大師與瑪格麗特》中體現的宗教思想。另外，亞布拉可夫（Е. А. Яблоков）所作的《布爾加科夫的藝術世界》（*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Михаила Булгакова*）針對布爾加科夫作品中的各個主題進行分析，包括《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時間與空間、人物與情節等等。

另有以《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城市空間為主題，相關研究書籍有夏芭林娜（Л. Н. Шабалина）的《莫斯科往日時光》（*Жили в Москве былой*），書中以《大師與瑪格麗特》作品出現的莫斯科地標為根據，尋找現今地標在莫斯科是否仍舊存在；列斯克斯（Г. Лескис）與阿達洛娃（К. Атарова）所作的《〈大師與瑪格麗特〉小說導覽》（*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по роману Михаила Булгаков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將《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出現的角色、引用之典故、地名、口語特色等名詞以編寫字典的方式依字母排序，向讀者介紹作品中名詞的概念。

在俄文期刊論文方面，費多洛夫（Ф. П. Федоров）的〈關於《大師與瑪格麗特》注解的幾點看法〉（*Несколько Мыслей по поводу комментария к Мастеру и Маргарите*）除了提及《大師與瑪格麗特》的宗教問題外，也認為作品具有反映蘇聯歷史背景的元素，

存在著當時蘇聯社會的社會制度；達布連科（Е. Добренко）的〈史達林文化——二〇年代後〉（*Стал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спустя*）也認為《大師與瑪格麗特》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蘇聯背景。除了提及反映蘇聯時期的文章外，蕭欣（В. А. Шошин）的〈二十世紀語境中的布爾加科夫〉（*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в контексте XX века*）對《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空間進行分析，將空間分為內部與外部，內部為撒旦所存在的空間，而外部則為莫斯科場景的空間。上述幾篇論著，對本論文起相當程度的啟發作用。

另外一位學者庫金娜（Н. В. Кузина）的〈面對真理〉（*Человек перед лицом истины*）除了認為《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出現的動物具有象徵意義外，也對作品的空間做分析，認為白遼士的住宅扮演連接撒旦空間的角色。耶諾夫斯卡亞（Л. Яновская）在〈布爾加科夫研究中的耶舒阿與彼拉多〉（*Понтий Пилат и Иешуа Га-Ноцри. В зеркалах булгаковедения*）中將《大師與瑪格麗特》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角色進行定位與分析。針對作品中角色進行分析的還有庫茲涅佐夫（Э. Кузнецов）〈誰是柳欣？〉（*Кто такой Александр Рюхин?*），作者認為作品中的角色柳欣與作家馬雅可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1893-1930）有其相像之處。而緬欣可娃（Е. Меньшикова）作之〈藝術中的音樂性〉（*Музыкальная скрижаль искусства*）對《大師與瑪格麗特》中不同場景出現的音樂提出其象徵意義。

在英文研究專書方面，布胥（R. L. Busch）所作《布爾加科夫之〈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語境》（*The Contexts of Bulgakov's Master i Margarita*）中提及布爾加科夫創作《大師與瑪格麗特》的背景與原因並對其情節與人物一一做介紹，並強調其重要性；亞歷山大·佐科夫斯基（Alexander Zholkovsky）的《文本遇見文本：重讀俄國文學史》（*Text counter text : rereadings in Russian literary history*）針對《大師與瑪格麗特》的蘇維埃主題進行研究。

在中文研究方面，目前以布爾加科夫與《大師與瑪格麗特》為研究主題的著作仍以

大陸方面居多，包括傳記式書籍《米·布爾加科夫》（錢誠），分別將布爾加科夫的人生分為幾個時期，描述不同時期布氏的境遇與作品背景，特別寫到《大師與瑪格麗特》是如何產生的；《滑稽面具下的文學騎士——布爾加科夫小說創作研究》（謝周）分析布氏小說，第一部分為前期小說的研究，第二部份則是針對《大師與瑪格麗特》，並分為情節與人物、對話精神缺失、象徵意義等進行分析。另有《布爾加科夫創作論》（溫玉霞），同樣也將布氏分幾個時期做介紹，並對其小說做分析，針對《大師與瑪格麗特》方面包含對其定義為批判現實主義小說，提及作品的道德哲學觀與人物形象等。

在中文期刊論文方面，大陸的期刊論文有：〈試論《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耶舒阿〉（殷明明）以宗教的角度分析作品中的耶舒阿；〈《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怪誕諷刺的審美功能〉（孫亦平）則對於作品的創作美學做探討，作者認為《大師與瑪格麗特》用各種的怪誕手法創作：人體的變形、超現實的場景等，具有其藝術衝擊力。另有〈「家」與「偽家」：《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兩種對立的精神世界〉（趙曉彬）具體分析小說中的藝術空間，如公共住宅、別墅、地下室與宮殿等特徵，闡釋家與偽家的對立形象，從而揭示布爾加科夫對「家」這一概念的獨特認識。

至於在台灣期刊論文則有：〈布爾加科夫長篇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中邪惡勢力之結構形成與作用分析〉（陳茵茵），作者以撒旦（沃藍德）為首的「惡徒」們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角色的起源、布爾加科夫對角色的詮釋及各角色在作品中的演變轉換現象，另外特別專注邪惡勢力在小說中的功能，並分析每一個惡魔角色在文中的行為舉止。¹⁷〈俄國二十世紀 20-30 年代文本的宗教意識研究〉（賴盈銓），作者以宗教的角度探討幾位社會主義寫實文學作家的作品，包括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作者認為《大師與瑪格麗特》對於讀者的影響是正面觀照人性弱點與自我洗滌（катарсис）¹⁸。

¹⁷ 陳茵茵，〈布爾加科夫長篇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中邪惡勢力之結構形成與作用分析〉，碩士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03，頁 117。

¹⁸ 賴盈銓，〈俄國二十世紀 20-30 年代文本的宗教意識研究〉，《俄語學報》，第九期，2005，頁 98。

綜觀現今研究《大師與瑪格麗特》的各個層面，包含宗教、二元對立、善與惡、時間與空間、角色象徵意義及音樂性等等，這些層面只對日常生活方面點到為止，例如將作品中的地標或是小說中出現的名詞做為研究對象，並沒有對於日常生活有更多描述或是對文本做進一步分析。因此，以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討《大師與瑪格麗特》為一特別研究方向，是故本論文將以《大師與瑪格麗特》文本為主，參考歷史與文化層面探究作品中反映的蘇聯時代。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說明

壹、研究架構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 一、 歷史學研究途徑
- 二、 日常生活行為詩學研究途徑
- 三、 文學社會學研究途徑
 - (一) 盧卡奇的文學社會學概念
 - (二) 郭德曼的文學社會學概念

貳、研究方法

- 一、 文本分析
- 二、 傳記分析
- 三、 歷史文化語境分析

第三節 文獻回顧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說明

壹、研究架構

貳、章節說明

第一章 作家與時代

第一節 1920-1930 年代的蘇聯社會文化現實

第二節 布爾加科夫之生活與創作

第三節 小結

第二章 《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文學團體」的形象分析

第一節 「文學團體」在俄國

第二節 「文學團體」映現之行為模式與集體意識

第三節 團體與個人衝突的思考——論大師的命運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映現當代生活——《大師與瑪格麗特》中住房問題的探討

第一節 1920-1930 年代俄國首都的「住房問題」

第二節 「家」與「城市」：《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公私領域的文化意義

第三節 小結

結論

貳、 章節說明

論文由緒論、本論和結論組成。「緒論」共分四節，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與方法、文獻回顧及研究架構與章節說明。第一節說明動機及提出研究目的。第二節說明進行研究時所使用的方法。第三節說明目前相關研究概況。第四節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架構與各章節主要內容。

本論分為三章。第一章「作家與時代」將從歷史角度出發，說明蘇聯 1920、30 年代的社會文化現實，包括社會方面（日常生活）及文化方面（作家協會）的普遍現象與

背景。第二節介紹布爾加科夫的創作主題思想進一步帶出布氏的當代生活，包括布氏與統治者的關係及其日常生活問題。

第二章為「《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文學團體」的形象分析」。本章根據洛特曼與郭德曼的理論概念，以史實及文化語境為背景，探討文本中出現的文學團體現象。第一節將闡述文學團體在俄國文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第二節〈「文學團體」映現之行為模式與集體意識〉中探討 1920 及 1930 年代因政治因素造成的一言堂情勢，分析小說中「莫文聯」(МАССОЛИТ)的特殊時代意義，再於第三節〈團體與個人衝突的思考——論大師的命運〉中對照主角大師與「莫文聯」，進一步闡述創作個體在時代中所遭遇的悲劇。

第三章為「映現當代生活——《大師與瑪格麗特》中住房問題的探討」。論文作者從盧卡奇的文學社會學概念解釋出發，再陳述「住房問題」的起因與當時此問題造成的社會現象，以解釋由莫文聯主席之死產生的「住房戰爭」，以及瑪格麗特、大師住家等空間議題所引發的「私領域」問題之思考。

最後為結論，對於前三章所做的陳述與分析作一總結，證明所運用之理論恰當並合理及《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出現的兩大主題反映社會現實且與布爾加科夫本人密切相關。

第一章 作家與時代

俄羅斯作家布爾加科夫的作品反映當代元素。在《大師與瑪格麗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中，1920-1930年代的莫斯科為小說時空背景，作家將當時社會、經濟等狀況以奇幻與諷刺的手法寫出。由於1920-1930年代的俄國與布爾加科夫的生活狀況密切相關，本章主要陳述社會現實，並說明布爾加科夫及其作品與當代社會之關聯。

第一節 1920-1930年代的蘇聯社會文化現實

1917年在俄國史上發生的兩次革命——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兩者皆為俄國發展帶來重大的轉變與影響。兩次革命發生的原因，歸因於長期以來俄國在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變化。

壹、1917年後俄國的發展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РСФСР)於1918年正式成立。為了因應內戰，實施「戰時共產主義」(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戰爭造成飢荒，政府徵收糧食造成農民極大損失。1922年內戰結束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СР)，就此成立。

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Большевики)雖掌握政權，接踵而至的國內戰爭與外強干涉，使國家的經濟遭到嚴重破壞。「1920年石油產量為戰前的40%，大多數工廠停

工。日用工業品與糧食極度缺乏，人民生活十分艱難。」¹⁹大批工人失業，經濟困難引起工農群眾對政局現狀的不滿。尤其當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持續實施，政府徵收糧食，人民的反抗情緒愈加強烈，許多地區皆出現工人罷工事件。經濟上造成的緊張情緒，在 1921 年水兵叛變中爆發，列寧（В. И. Ленин, 1870-1924）意識到經濟對於鞏固政權的必要性，認為挽救經濟，需要用一種新的經濟政策代替嚴重錯誤的「戰時共產主義」。

1921 年 3 月 21 日，列寧在第十次共產黨代表大會上表示：「國家正處於貧窮、損失慘重且疲憊的狀態中，我們的首要目標就是從事工農上的生產。」²⁰在此項宣言之後，列寧準備對國家進行「新經濟政策」（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НЭП）。「新經濟政策」主要從改革農業開始，列寧認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必須採取最迅速且堅決的辦法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並提高他們的生產力。²¹「新經濟政策」的核心內容為廢除餘糧徵集制（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實行糧食稅，農民納稅後的糧食可以自由買賣。其它施行內容包括放棄貨幣交換的主張，確認自由貿易的原則、改革工業、推行租讓制等等。另外，在「戰時共產主義」實施的實物平均配給制也改為貨幣工資制。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國民經濟恢復並取得有效成果。到 1925 年，農業總產量為戰前的 87%，而在工業方面的產量也達到很高的水準，為政府爾後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基礎。新政策上糧食可自由貿易，社會出現貿易致富的富農，這些人被稱為「耐普曼」（Nepmen），「耐普曼」的出現成為「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的一大現象。這些貿易致富的人，與共產革命的「平等」本意相衝突，也引起社會上其他人不滿。在 1928-1929 年間，史達林利用社會上的不滿情緒說服政府當局制止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列寧死後黨內勢力分派，史達林拒絕延長「新經濟政策」，改採五年經濟計畫。²²

¹⁹ 曹廷清、楊成竹，《蘇聯簡史》。台北：五南，1993，頁 90。

²⁰ 參考自：Vernadsky G.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23.

²¹ 同註 19，頁 93。

²² 參考：Ziegler C. *The History of Russia*. Santa Barbara, Calif.: Greenwood Press, 2009. p. 74.

貳、 1920-1930 年代的蘇聯文學發展

十月革命後，政權的統治對社會各層面影響甚大，控制人民的自由與思想，使得知識份子深受其害。一黨專政的布爾什維克，將反對者視為敵人，眾多文學家被列為資產階級份子而遭迫害，生活陷入困境；部分作家加入白軍對抗政權，後來移居國外。為了鞏固新政權，政府在文學中加入無產階級思想，決定蘇聯文學的發展方向。

新蘇聯成立初期，文學生態百家爭鳴，創作方法繁多，1922 年成立的「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簡稱「拉普」(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РАПП)，是最大的文學團體，與 1923 年成立的「莫普」(Москов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МАПП)，和 1925 年以「拉普」為核心成立的「伏阿普」(Всесоюз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Ассоциаций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ВОАПП) 成為蘇聯作家主要協會。²³以「拉普」為首，出版《在文學崗位上》(*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осту*) 雜誌，形成文學批評流派，另外與「拉普」同時的還有「謝拉皮翁兄弟」(Се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 及「山隘」(Перевал) 等。1925 年，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黨對文學管理方面的新政策，政策將作家分為四大類。分類的方式並非依照作家的才能或文學派別做區分，而是從階級特徵來分類。依照此方式作家分為：共產作家、農民作家、同路人(попутчики)²⁴及與政權敵對者。²⁵共產作家與農民作家受到政府支持並給予栽培，而同路人及與政權敵對者則可能遭政府當局迫害。

²³ 周雪舫，《俄羅斯史》。台北：三民書局，2005，頁 185。

²⁴ 「同路人」原指在重建時期與共產勢力合作的作家，而「文學同路人」(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опутничество) 一詞也帶有政治色彩，1925 年在第一次全蘇聯共產作家會議(Всесоюз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ролетписателей) 的決議中，認為帶有「同路人」色彩的作家在文學創作中扭曲並且貶低共產革命，「同路人」的文學基本上就是反對共產革命的文學。參考網路資料：<http://slovari.yandex.ru/~%D0%BA%D0%BD%D0%B8%D0%B3%D0%B8/%D0%9B%D0%B8%D1%82.%20%D1%8D%D0%BD%D1%86%D0%B8%D0%BA%D0%BB%D0%BE%D0%BF%D0%B5%D0%B4%D0%B8%D1%8F/%D0%9F%D0%BE%D0%BF%D1%83%D1%82%D1%87%D0%B8%D0%BA%D0%B8/> (資料擷取時間：2011.07.18)

²⁵ 詳參：Баевский 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 Компендиум. — М.: «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1999. с. 107.

從史達林（И. В. Сталин, 1878-1953）掌權開始，文學受到極大的限制，許多作品被認為影射政權而遭禁，作家甚至被捕入獄，「拉普」等文學團體被迫取消，其他作家協會也遭批判，最後由政府統一成立「蘇聯作家協會」（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接管並處理所有文學事宜。

史達林認為文學創作必須有統一原則，因而提出「社會主義寫實主義」（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²⁶寫作綱領。綱領提出後，被視為蘇聯文學創作的核心思想，作家必須遵循政府規定的模範（exemplar）寫作方式進行創作。²⁷「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寫作綱領的概念雖是反映社會主義現實，卻只侷限於描寫社會的正面形象，而非真正反映現實。違反此項綱領的作品不僅無法出版，作者自身也會遭受牽連。一旦遭受批判，部份作家只能轉為地下創作，有些作家經相關單位審核後，仍有機會出版作品。政府對於異議者的懲罰方式，除了強化意識型態宣傳、禁止作品出版、關押入獄之外，也採取送入精神病院，或是強制驅逐出境的方式。

1929 年代末，史達林在思想文化政策上進行「大轉變」（Великий перелом），目的在透過整肅的手段清除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隨後的 30 年代，社會思想更為封閉，書報檢查制度（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更加雷厲風行。「在史達林的政策下，有目的進行壓制的手段，而作家首當其衝。蘇聯文學就是一種高壓文學，在各個機關下，採用秘密情報員的方式來做監控。」²⁸政府將檢查制度分為五級，除了思想審查，還需通過黨內懲治性檢查，而且規定日漸繁雜，舉凡違背無產階級思想、有唯心主義思想、讚揚舊生活方

²⁶ 所謂「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根據蘇俄文藝理論家吉爾波丁（V. Kirpotin）的解釋：是集團主義的文藝，而非個人主義的文藝。其創作方法，是過去一切創作方法優點的綜合，將舊的寫實主義、浪漫主義乃至古典主義等等藝術方法接受下來，而新的世界觀——勞動階級的世界觀，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的水準上綜合運用，去對現實做最正確最明顯的描寫。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者，並不在歷史的階層去尋找個人主義的東西，卻是努力描寫出事件和人類之政治的階層意義。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特質，是由那社會的東西對於個人的東西之優位中所產生的。參考：謝幼偉等著，《蘇俄研究論集》（二）。台北：中華文化會，1955，頁 265。

²⁷ 參考：Clark K.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 Ritua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4.

²⁸ 參考自：Соколов А. *Покол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СПб.: Изд-во СПбГУП, 2009. с.563.

式、帶資產階級道德成分，甚至連無思想性的作品都加以查禁。²⁹這些繁雜項目因檢查人員理解程度不同，反而出現多重標準。書報檢查制度將敵對的對象從社會轉至黨內，藉由對書報的監控，封鎖社會與黨內訊息，形成文化專制。

參、 1920-1930 年代的蘇聯日常生活

在本節第二部分敘述的新經濟政策，對蘇聯日常生活方面也影響甚大。1920 年代初期起，蘇聯政府欲建立新生活制度，取消上層階級（包括貴族地主及資產階級）及私有財產制，實行全面國有化與思想上的統一。不同於西方國家追求法制上的社會平等及強調物質上的獨立性，政府捨棄舊有生活並反對私有及「個人」的觀念。「蘇俄人口有一半是農民，其次是工人、奴工和知識份子，這幾種人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不但失去了財產，而且失去了一切自由，他們의思想和行動都受共產黨的嚴密控制。」³⁰隨後的內戰，軍隊的糧食無法供應，遂採餘糧徵集制(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徵收農民的糧食，蘇維埃政權將糧食集中至城市，導致鄉村糧食缺乏，人民必須花費更多時間與力氣找尋糧食，「貧困」、「匱乏」自此成為人民生活中常見的辭彙。

蘇聯統治早期，居民捨棄過去舊的生活型態，而新生活的建立改變許多日常生活方式。在住房方面，出現了公共住宅(коммуналка)這種居住空間狹小、室內陳設簡陋，「室內陳設」(интерьер)概念幾乎消失。在公共住宅中，不同背景的人擠在同一個狹小的環境中生活，影響其日常行為及心理狀態。「人們在這種聯合居住的環境下，被迫與鄰居有著同樣的習慣、生活方式及思維模式，並且造成衛生的維護不佳。人民所能使用的空間有限，衛生設備皆為公用，如有疾病發生也很難有效隔離，因此造成傳染的擴大，人民的衛生條件難以維持。」³¹

²⁹ 沈志華主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71-1991）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1094。

³⁰ 謝幼偉等著，《蘇俄研究論集》。台北：中華文化會，1955，頁 109。

³¹ 參考：Семенникова Л.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М.: МГУ,

雖然蘇聯政府在政策上將工人階層列為住房的優惠對象，事實上所有人皆遭遇「住房危機」(жилищный кризис)，這種情況在城市中更顯嚴重。而居住空間不足，也造成大眾互相「監視」的現象。為了迎合當局要求，舉發「特殊份子」成為人民獲得獎勵或更多居住空間的方式。

儘管人民普遍生活艱苦，蘇聯社會中仍有特權階級產生，其中包括政府官員、科學家或是文學界人士。這些人不僅享受優渥物質生活，甚至能擁有獨戶住宅。與擠在狹小空間的百姓生活迥然不同。這種社會現象看在布爾加科夫的眼中，也成為他的創作素材。



第二節 布爾加科夫之生活與創作

布爾加科夫 (М. А.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 的寫作多從現實生活出發，從他投身於創作起，就處在俄羅斯爆發十月革命後的混亂時期，作家用自身的感受寫出日常生活環境的變化。因此，在研究布爾加科夫的創作時，應先瞭解其生活狀況，並探究其寫作風格之由來，以及重要創作主題。

壹、 布爾加科夫的生活

在《布爾加科夫創作論》書中，溫玉霞論述作家之創作素材皆源自真實生活：「文學創作的素材來源於社會生活，它以精神形象存在作家的內心，是作家從客觀的社會生活中獲取的刺激或信息，作家在此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或改造，使之成為創作性的產品。」³²十月革命爆發後，新政權初建立，國家面臨內戰與外敵的侵略，此時布爾加科夫在前線擔任軍醫。身為軍醫的期間，布氏深感戰爭的殘酷，而戰後國家受創嚴重，社會秩序混亂，人民普遍生活窮困的社會背景，都是促使布氏投入寫作的動機。

布爾加科夫出生自烏克蘭基輔的知識份子家庭，自小受到父親的影響，接觸許多關於歷史、文學等作品，父母對布爾加科夫及弟妹們的陪伴，使他對於童年的「家」有美好的記憶，在往後的創作，「家」的主題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受到家庭的影響，布爾加科夫選擇成為醫生。他和契訶夫 (А. П. Чехов 1860-1904) 一樣，具有醫師的身分，同時也對創作抱有極大熱情。一次大戰爆發，布爾加科夫選擇加入紅十字會，此時他體會到戰爭帶來的恐懼與死亡，並且欲對所見之事進行記錄。這些行醫時的經驗對他日後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

³² 溫玉霞，《布爾加科夫創作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 23。

除了家庭教育影響及行醫經驗積累外，布爾加科夫自小也因受到果戈里（Н. В. Гоголь, 1809-1852），謝德林（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1826-1889），托爾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等作家的作品薰陶。果戈里利用諷刺與荒誕的寫作方式創作；謝德林的作品也著重在書寫當代現實、反映社會；而托爾斯泰的作品具有宗教色彩，對於布爾加科夫的寫作方式也有很大的影響。

1921年為布爾加科夫創作生涯中的轉捩點，此時莫斯科正經歷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過渡時期，人民生活困難，食物匱乏。布氏初到莫斯科的日子也不好過，他遇到在20年代普遍的住房問題，同時在創作上也屢遭挫折，度過一段無法發表作品的日子。由於政權將中心轉移至城市，許多農民轉至城市中尋找工作，導致城市的居住空間大量減少，初期布氏住在公共住宅大花園街10號樓50號房（Дом № 10 в квартире № 50 на Большой Садовой），「這個大公寓變成集體居住的系統，長廊上只有一間廚房，甚至沒有浴室，在公寓中除了布爾加科夫還住了五個家庭。」³³作家鄰居加布里洛維奇（Е. Габрилович）憶起當時的居住環境時，說道：「在30年代初，幾乎所有作家都住在公共住宅裡，我登記到一處有浴室、看得見大門的陽台及頂樓的房子，之後才發現家具皆已破舊；陽台並非只有我家專用，其他的鄰居也有通往陽台的門。而那扇門中住著布爾加科夫一家人」³⁴。

公共住宅對布氏造成很大的困擾，而這個影響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例如《13號——埃爾皮特·拉布柯蒙的住宅》（№13. – Дом Эльпит-Рабкоммуна）、《左亞公寓》（Зойкина квартира）、《關於住房的論文》（Трактат о жилище）及《20年代的莫斯科》（Москва 20-х годов）等等，皆是關於住房問題的作品。

1921年布爾加科夫在教育人民委員部文學處（ЛИТО）擔任秘書，作品《袖口雜記》

³³ Бояджиева Л. Москва Булгаковская. М.: Астрель: Олимп, 2009. с. 82.

³⁴ 參考：收錄在 Булгаков М.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Роман. (книга для ученика и учителя.) – М.: Олимп;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1996. с.534.

(*Записки на манжетках*) 即為對此時生活的描寫。不久文學處遭取消，他隨即失業，在親戚的幫助下，生活暫時有保障。於此同時，布爾加科夫開始在各大雜誌刊登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作品《魔障》(*Дьяволиада*) 與《不祥的蛋》(*Роковые яйца*)。1922年，布爾加科夫在《前夜》(*Накануне*)³⁵雜誌撰寫文章，發表了有關莫斯科的小品文，包括《乞乞科夫的奇異經歷》(*Похождения Чичикова*) 及論文形式的《20年代莫斯科》(*Москва 20-х годов*) 探討住房問題。在這些作品中，布爾加科夫以迫切的日常生活問題為主題，反映現實生活，將住房、官僚主義等等需要關注的問題一一提出，《不祥的蛋》就被指為諷刺蘇聯政權，「在《不祥的蛋》之後，布爾加科夫的作品就受到嚴厲的監視，而預備要刊登的《狗心》，也被取消，之後再也沒見到作家的作品。」³⁶

而戲劇作品部份，布爾加科夫在戲劇創作中濃縮反映現實生活，集中地表現矛盾衝突，揭示「知識分子與革命」、「作家與政權」、「藝術與權力」的關係等主題。³⁷ 作品包括《圖爾賓一家的日子》(*Дни Турбиных*)、《佐伊卡的住宅》(*Зойкина квартира*) 及《逃亡》(*Бег*) 等。《圖爾賓一家的日子》由《白衛軍》(*Белая гвардия*) 改編而成，內容藉由白衛軍軍官圖爾賓及其家人的命運，帶出國內戰爭的歷史及揭示白衛軍最終失敗的結局。《佐伊卡的住宅》諷刺新經濟政策時期社會的醜惡現象，而《逃亡》則是接續《圖爾賓一家的日子》的思想，布氏著眼於描繪白衛軍在逃離祖國的過程中的各種心態、情緒，及逃往國外後的移民生活。《圖爾賓一家的日子》被蘇聯中央認為是反革命的戲劇而遭封殺，其他戲劇作品也被迫停演。1929年寫信給史達林與高爾基 (А. 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信中提到戲劇遭禁演、住家遭搜查，日記與《狗心》原稿遭沒收等事件：

1926年，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人把我帶到政保總局，對我進行審

³⁵ 此雜誌創刊於1922年。由俄羅斯第一批移民國外的僑民創辦。雜誌與蘇聯政府合作，旨在勸說在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時期離開俄羅斯的許多文化活動家回歸俄羅斯。在蘇聯政府的支持下，雜誌成立莫斯科編輯部，用飛機將雜誌運到德國柏林。詳參：溫玉霞，《布爾加科夫創作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38。

³⁶ 參考自：Соколов Б. 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загадки судьбы. – М.: Вагриус, 2008. с. 273.

³⁷ 同註35，頁125。

訊，幾個月前，他們搜查過我的住宅，沒收我的三本日記和中篇小說《狗心》僅有的一份原稿。

我的《袖口雜記》被禁止出版。已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魔障》被禁止再版；原在《俄羅斯》雜誌連載的長篇小說《白衛軍》也因雜誌本身遭禁而中斷。我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我曾向當局申請，允許我到國外去，但我的申請遭到拒絕。

為何要對一個無法在國家發表作品的作家施壓，要求他留在國內？是要保證他的必死無疑嗎？我所有的戲劇被禁，作品也無法出版，過去十年我寫的東西在蘇聯遭毀，現在又要來毀了我，我請求他們做出一個人道的決定，並且讓我走！³⁸

高爾基相當同情布爾加科夫的處境，並試圖提供援助，但因時勢所逼，布氏生活上並無明顯起色。「1929 年有位別洛采爾科夫斯基的人寫信給史達林，提醒黨總書記注意『文學藝術領域中的右傾危險』，並且以布爾加科夫的戲劇為例」³⁹，這個事件發生後，布氏的狀況更是雪上加霜。創作生活的不順遂，使布爾加科夫對創作產生絕望，甚至將自己的作品草稿燒毀。在此之後，雖經史達林同意，戲劇又能在劇院上演，但布氏的創作生活最終卻未能有好的結果，他的部分作品直到本人去世後才得以出版。

儘管布爾加科夫在創作上受到政府當局的阻撓，但他仍堅持在創作上反映社會現實的寫作原則。而混亂的時代、知識份子家庭的養成背景、行醫經驗等因素，加上師承果戈里的寫作手法，使布式獲得更多的創作靈感，也造就他特殊的世界觀與美學觀。

³⁸ 轉引自：Shentalinsky V. *Arrested voice: resurrecting the disappeared writers of the Soviet regim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p.79.

³⁹ 錢誠，《米·布爾加科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頁 91-92。

貳、 布爾加科夫之創作主題思想

「文學要求忠實地描繪生活，反映現實。所謂的現實，首先是指人和社會。」⁴⁰布爾加科夫所處的時代政治動盪，戰亂四起，而作家要再現當代現況，就必須描寫人與社會，文學作品自然就成為作家對社會生活的精神反映。作家在作品中表現了對生活的感受與評價及其世界觀。「布氏的作品無法自他生活的時代中分離」⁴¹，他的作品皆表達了不同時期的思想與情緒。

在早期創作的小品文或雜文中，布爾加科夫運用類似報導的形式呈現當時社會狀況，例如在《關於住房的論文》（*Трактат о жилище*）及《20年代的莫斯科》（*Москва 20-х годов*）當中，皆論及1920年代莫斯科人面臨之住宅問題。《首都札記》（*Столица в блокноте*）描寫新經濟政策下城市的生活情況，包括因政策而致富的新農民等等，這些創作皆反映當代的人物與事件。

擔任軍醫時期，布爾加科夫目睹戰爭帶來的恐懼、死亡、殘酷等經歷，激發他寫出《一個年輕醫生的手記》（*Записки юного врача*），在這部隨筆集中，《公雞繡花巾》（*Полотенце с петухом*）講述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到偏遠鄉村醫院工作的故事；而《嗎啡》（*Морфий*）則是布爾加科夫在為病人動手術時因感染病毒而染上嗎啡毒癮的經歷。隨著生活閱歷逐漸增加，布爾加科夫對社會的認識也越見深刻。《袖口雜記》（*Записки на манжетах*）是布爾加科夫到莫斯科，四處漂泊生活與工作見聞，他描寫自己曾在文學出版社工作時所見之真實情況。布氏以「手記」方式完成作品，他經歷的生活現實變成文學情節。

⁴⁰ 溫玉霞，《布爾加科夫創作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53。

⁴¹ 參考：Корман Б.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Ижевск: Типография Удмур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8. с. 681.

20 年代起，布爾加科夫開始在創作中融合日常生活及諷刺，寫出嘲弄社會卻又反映現實的作品，根據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 1895-1975）的說法，「諷刺是對當代現實各個不同方面的形象否定，形式上各有不同，具體和明晰的程度各有不同。」⁴²，在諷刺中，形象性否定可以採用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為笑謔的，把否定的現象描繪成可笑的东西加以嘲諷。第二種形式為嚴肅的，把否定的現象描繪成討厭的、可惡的、令人反感和憤怒的東西。」⁴³布氏的作品具有笑謔的成分，又有嚴肅的諷刺，加上荒誕的情節描述了社會的醜惡與不堪。

布爾加科夫的諷刺寫作方式源自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傳統，其作品例如：《乞乞科夫的奇異經歷》（*Полождения Чичикова*），描寫 20 年代初莫斯科的生活現實，揭露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出現的社會現象，此部作品被認為是對果戈里的《死靈魂》（*Мёртвые души*）的仿造（*стилизация*）。錢誠在《米·布爾加科夫》書中說道：「這部作品是模仿、甚至是仿造了果戈里的作品。篇名和人名大多與果戈里作品中類似，所用的語言也是尖刻的嘲諷，在布爾加科夫筆下復活的是新經濟政策時期更大膽、更貪婪的乞乞科夫，已不是《死靈魂》中的那個。」⁴⁴

在《乞乞科夫的奇異經歷》中，除了乞乞科夫之外，其他人物的性格、情節設置也大致與《死靈魂》類似。「乞乞科夫仍然八面玲瓏、投機取巧，只不過他在果戈里筆下收購死靈魂，而在蘇俄則是從事外貿、承辦企業及電氣化工程。」⁴⁵另外，也有評論者認為此作品的諷刺對象是殘餘的俄國舊制度。布氏在莫斯科的困苦生活為他提供了大量見聞並注意到影響新生活的始作俑者，「那些在沙皇制度下形成的人，在進入新生活時背著過去舊制度的包袱——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⁴⁶

⁴² 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譯，《巴赫金全集——文本、對話與人文》（第四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23。

⁴³ 溫玉霞，《布爾加科夫創作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 42。

⁴⁴ 錢誠，《米·布爾加科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學講堂），2008，頁 66。

⁴⁵ 謝周，《滑稽面具下的文學騎士：布爾加科夫小說創作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頁 19。

⁴⁶ 參考自：Петелин В. *Жизнь Булгакова. Дописать раньше, чем умереть.* – М.: ЗА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5. с. 87.

除了諷刺手法，布爾加科夫也將象徵或隱喻的手法加入作品中，「他將模擬的對象直接轉為隱喻的人和物，如房子、城市、莊園、火光等，皆成為他筆下表現的主題或元素」⁴⁷，布爾加科夫的短篇小說《13 號－埃爾皮特－拉布科蒙的房子》（№13. – Дом Эльпит-Рабкоммуна）中通過「房子的主題」（тема дома）揭露社會現象，房子的主人埃爾皮特被視為反革命份子，其所住的 13 號房子被沒收，並為所工人強佔，他們改變格局，破壞房子的完整性，導致房子鬧鬼。數字「13」在西方代表不祥，布爾加科夫在作品中加入了魔鬼的元素，這些象徵或隱喻的描寫方式，成為作家喜愛的手法。

到了 20 年代中期，布爾加科夫在創作中又加上了「怪誕」（гротеск）元素，他於 1923 至 1925 年間完成《魔障》、《不祥的蛋》、《狗心》，三部中篇小說就是布氏荒誕諷刺的代表作。1924 年發表的《魔障》中，講述蘇聯官僚體制與「小人物」的衝突，最終小說以「小人物」失敗告終。作品出現缺鼻子、斷臂的怪人，場景為陰森潮濕的走廊，布氏通過這些怪異的細節來諷刺官僚主義。

在此之後的作品《不祥的蛋》，描寫大學教授在實驗室裡研究能使生命復活，並增強體質的一種紅光，教授也因此成為家喻戶曉的科學家。教授的助手用這個紅光來孵蛋，但是幾天之後孵出的並不是小雞，而是一堆恐怖的怪物，這些怪物攻向莫斯科，直到嚴寒來臨怪物們凍死才結束事件，教授被歸罪是事件的起因而遭打死。小說中出現的「紅光」被認為隱射蘇聯，「以作者的評價所建構的人物與情節，是作者對時代的行為反應。」⁴⁸布氏試圖利用教授最後的死亡，表現當時的知識份子在政府迫害下的悲劇結果。

《狗心》是布爾加科夫繼《不祥的蛋》後，寫出的另外一部利用怪誕手法，諷刺蘇

⁴⁷ 溫玉霞，《布爾加科夫創作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 83。

⁴⁸ 參考：Чудакова М.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шлого*. –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1. с. 291.

聯的作品，故事描寫一隻流浪犬沙里克（Шарик）經由器官移植變為波里格拉夫·波里格拉弗維奇·沙里科夫（Полиграф Полиграфович Шариков），且具有人性的醜惡面，最後教授又將器官移出，讓沙里科夫回歸原本的沙里克。作家利用隱喻，暗指社會中存在騙子、貪官、奸商等等的人物，傳統道德受到威脅，社會並沒有在蘇聯政權的統治下有所改善，人民的文化素養也沒有提升。例如書中描寫公共住宅中，居民髒亂的壞習慣，造成他人不便，表現蘇聯社會人民肆意的破壞行為及社會治安不良的狀況：

為什麼這事兒（社會革命）一鬧起來，大家就穿著骯髒的套鞋和氈靴往大理石樓上踩？為什麼套鞋直到今天還得用鎖鎖起來？還得派個士兵看守，防止有人順手牽羊？難道卡爾·馬克思禁止在樓梯上鋪地毯？為什麼無產者不能把自己的套鞋放在樓底下，非得把大理石踩髒不可？⁴⁹

綜觀布爾加科夫的作品，我們發現作家的創作主題不斷重複出現，如：「城市」、「家園」及「房子」等。「布爾加科夫——擅長以城市為主題的作家，以對城市形象的評價來建構其作品的藝術空間。」⁵⁰他的多部作品具有「城市」的主題，例如：《20年代的莫斯科》、《首都雜記》、《關於住房的論文》、《13號—埃爾皮特—拉布科蒙的房子》、《乞乞科夫的奇異經歷》、《不祥的蛋》、《狗心》及《大師與瑪格麗特》，故事進行皆是以莫斯科為背景，而《白衛軍》與《基輔城》（Киев-город）也是描寫烏克蘭城市基輔。

至於在描寫「房子」主題中，除了寫出住房問題之外，也利用「火」來作為對當代社會文化的毀滅，「用水淹或是火燒的方式來毀滅世界是布爾加科夫作品經常出現的方式。」⁵¹如《13號—埃爾皮特—拉布科蒙的房子》的房子在最後被燒毀。「房子」的主題衍伸出對「家」的觀念，而關於布爾加科夫對於「家園」的描寫中，《白衛軍》為一代

⁴⁹ 布爾加科夫著，曹國維譯，〈狗心〉，《不祥的蛋》。上海：上海譯文，2005，頁121。

⁵⁰ 參考：Яблоков 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Михаила Булгакова. –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1. с. 182.

⁵¹ 同上註，頁183。

表作。城市佈滿戰爭帶來的混亂，人民四處逃亡躲避危險，相對圖爾賓一家的「家」則是安全的避難所，戰爭帶來的苦難突顯出「家園」的重要性，「布爾加科夫認識到，以戰爭的方式來恢復家園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戰爭導致的死亡及仇恨是與溫暖、平靜的家園相衝突的。」⁵²

布爾加科夫運用諷刺、怪誕、象徵、隱喻及魔幻等手法寫作反映現實，《大師與瑪格麗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為其集大成之作。這部作品包含歷史、現實及幻想成分，作家利用空間與時間的交替，撒旦的懲戒等情節帶出故事，用以表達自己對蘇聯社會的想法。上段筆者提到，「城市」與「房子」為布爾加科夫作品中常見的主題，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主要也以莫斯科為背景，描寫蘇聯城市中的社會現象。其中，文學團體、住房問題、劇場人員及房管主任的貪婪、莫斯科人民的無知、大師探討宗教議題卻被關進精神病院等等，皆是布氏為諷刺社會所做之情節安排。此外，「莫文聯」（МАССОЛИТ）主席的住房、瑪格麗特的家及「格里鮑耶陀夫之家」（Дом Грибоедова）等等，也反映當代社會權力者在住房上的優勢。

《大師與瑪格麗特》故事發展最初，布爾加科夫以文學團體「莫文聯」兩位作家的對話為開頭，接著帶出在莫斯科發生的一連串怪異事件。文學團體在當時具有操控文學發展的權力，其成員享受的是普通人民不能相比的優渥條件，布氏在作品中描寫引發住房問題的公共住宅及少數特權階級的獨戶住宅，其中衍生出權力擁有者引發的權力與空間的關係。而文學團體「莫文聯」本身帶有政治色彩，成員的行為與思維方式和「世界觀」也有特殊之處，本論文將在下一章節對《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文學團體「莫文聯」做進一步分析。

⁵² 謝周，《滑稽面具下的文學騎士：布爾加科夫小說創作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頁9。

第三節 小結

在本章第一節，筆者首先陳述 1917 年後俄國的發展。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掌權，為了因應內戰，社會採取「戰時共產主義」，1922 年內戰結束後，蘇聯正式成立。

由於內戰及外強干涉，加上「戰時共產主義」的實施，戰後的國家經濟嚴重受挫，人民及工人的反抗情緒高漲。列寧認為應採取新的經濟政策來取代失敗的「戰時共產主義」。1921 年，列寧準備對國家進行「新經濟政策」，政策內容對於農業及工業上有很大的轉變，包括糧食自由買賣、貨幣工資制等。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國家經濟獲得有效成果。

十月革命後的統治政權對社會各方面進行嚴密控制，知識份子也深受其害。許多作家被視為資產階級而遭受迫害，政府也在文學中加入無產階級思想，決定蘇聯的文學方向。

新蘇聯初成立，文學生態百家爭鳴，包括「謝拉皮翁兄弟會」、「山隘」、「拉普」等協會成立，文學能自由發展。1925 年，俄(共)中央委員會將作家分為四大類，並對與政權敵對者施壓。自史達林掌權，文學受到極大的限制。政府對全蘇聯文學團體進行統一，並且在創作上實行「社會主義寫實主義」，限制文學的發展，作家的創作及出版由政府決定，「書報檢查制度」也越加嚴厲。另外，在社會上，「無神論」的蘇聯政府鎮壓教會，禁止私自從事宗教活動，進而出現祕密集會。

1920 年代初期，政府欲建立新生活制度，在住房方面出現「公共住宅」的居住方式，幾戶住民擠在同個環境中，對於環境整潔、私人領域造成很大不便。居住空間不足，產生人民互相「監視」的現象，人民藉由告發特殊份子來領取獎勵。相較於普通人民居住

在狹小的公共住宅，上級幹部及為政府效力的知識份子等階級卻擁有特權，生活方面極盡奢華，與一般人民的生活形成強烈對比。

第二節，筆者介紹布爾加科夫的生活與創作。在前線身為軍醫的期間，布氏深感戰爭的殘酷，而戰後國家受創嚴重，社會秩序混亂，人民普遍生活窮困的社會背景，促使布氏投入寫作。

布氏的寫作方式受到家庭教育、行醫經驗及俄國小說傳統的影響，不僅反映社會現實，作品也充滿諷刺與幻想的元素。1921年，為布氏創作的轉捩點，他經歷在莫斯科生活匱乏、創作屢遭挫折的日子。此時居住的「公共住宅」在日後成為他創作中的重要主題。而布氏的諷刺筆法，在蘇聯被指影射政府，許多作品遭禁或沒收原稿，直到作家過世，作品才能一一問世。

布爾加科夫運用諷刺、象徵、隱喻及怪誕的手法進行創作。作品也包含「城市」、「家園」及「房子」等主題。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主要也以莫斯科為背景，描寫蘇聯城市中的社會現象。故事中的文學團體「莫文聯」，在當時具有操控文學發展的權力，其成員生活優渥，擁有獨戶住宅。團體的特權引發空間與權力的關係。而文學團體「莫文聯」本身帶有政治色彩，成員的行為與思維方式和「世界觀」也有特殊之處。

第二章 《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文學團體」的形象分析

洛特曼（Ю. М. Лотман）認為，日常生活文化（культура быта）是一種文化記憶，因為「生活與環境，甚至事物、服裝、風俗及社會組織的變化皆會影響人們的思考方式。」⁵³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在思想與行為上的表現，能幫助讀者一窺過去歷史樣貌，「我們必須將這些角色視為真實存在的人，並分析其習慣、穿著及生活方式，好探究角色思維與行為的背後原因。」⁵⁴在《大師與瑪格麗特》的藝術空間中，以「莫文聯」為代表的文學團體是理解 1930 年代俄國文學生態的關鍵。團體的思維與行為，在當代社會具有特殊意義，也能幫助了解文學團體改為官辦後的情況。在分析文本中的「莫文聯」前，必須了解文學團體在俄國的發展背景。

第一節 「文學團體」在俄國

西方世界中，十六世紀就已出現「文學團體」雛型——法國貴族夫人主持的沙龍。沙龍在法國文學史及政治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裡聚集藝術、科學及政治的代表，共同對於政治或是文學上的問題進行討論。⁵⁵到了十八世紀，沙龍不僅帶有文學色彩，也具有政治意義，特別是在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後，沙龍開始轉變成革命人士的聚會點。十八世紀時，隨著彼得大帝的西化政策，及其後幾任沙皇的大力推動下，沙龍或是文學團體（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ужок）等文人聚會形式也進入俄國，影響文學甚鉅。

⁵³ 參考：Лотман Ю.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 СПб», 2003. с. 351.

⁵⁴ 同上註，頁 351。

⁵⁵ 參考自網路資料：Брокгауз Ф. и Ефрон И. *Салоны*, http://dic.academic.ru/dic.nsf/brokgauz_efron/90391/%D0%A1%D0%B0%D0%BB（資料擷取時間：2011.02.05）

文學團體與沙龍有所不同，有人將兩者做比較，「文學團體為非大型，選擇在某處聚集，但沒有在機關作註冊登記的聚會，團體有自身的章程與規範，具有組織性與明確目的。團體的功能與目的隨著不同時代可能有所改變。」⁵⁶相較於文學團體的規範章程，沙龍屬於較任意的活動，由主人（通常為貴族夫人）邀約，性質較接近社交活動。

就文學功能而言，「文學團體較與作者密切相關，而沙龍則較接近讀者。文學團體主要從事與文學作品相關事務，沙龍則是實現文學上的需要。」⁵⁷也就是說，文學團體成員主要因為共同創作理念或世界觀而聚會，彼此間相互提攜，對於文學潮流之形成功居厥偉，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現代主義趨勢，即由不同團體共同形塑而成。

俄國從十八世紀30-40年代陸續出現文學團體，其活動並不侷限於文學討論。隨著凱薩琳大帝（Екатерина II Великая, 1729-1796）的改革，貴族階級自主意識提高，對文化的渴求程度相對提升，此一現象有助於文學團體的產生。十九世紀重要文學團體包括「俄羅斯語言愛好者會議」（Беседа любителей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 1811-1816）⁵⁸與「阿札瑪斯」（Арзамас, 1815-1818）。這兩個團體無論在文學語言和文藝思潮方面，均有不同看法。⁵⁹如果「俄羅斯語言愛好者會議」擁護舊斯拉夫語和古典主義，那麼「阿札瑪斯」的成員支持文學語言改革，主張以當代語言創作，並且極力跟隨西歐文學腳步，將感傷主義（сентиментализм）和浪漫主義（романтизм）精神帶入寫作之中，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

⁵⁶ 此概念引自網路資料：*Кружки и салоны XVIII века*.

<http://www.litra.ru/composition/get/coid/00735971223554786306/>（資料擷取時間：2011.02.05）

⁵⁷ 同上註。

⁵⁸ 會議領導人為施什科夫（А. С. Шишков, 1754-1841），而此文學流派日後為提尼亞諾夫（Ю. Н. Тынянов, 1894-1943）確立。參考：Эйдельман Т.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кружки и салоны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http://www.mossalit.ru/salon-oljgi-grushevskoi/salony-v-rossii/salony-do-revoljutsii.html>（資料擷取時間：2011.06.25）。

⁵⁹ 1803年施什科夫在《談論俄羅斯新舊語言的創作方式》（*Рассуждения 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слог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中批評卡拉姆金（Н. М. Карамзин, 1766-1826）對於語言上的改革，並且堅決捍衛書面用語及口語使用的界線，並拒絕使用外國用語；而「阿札瑪斯」成員不排斥外國語言，且提倡運用簡單、較口語化的方式進行創作。詳參：Эйдельман Т.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кружки и салоны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http://www.mossalit.ru/salon-oljgi-grushevskoi/salony-v-rossii/salony-do-revoljutsii.html>（資料擷取時間：2011.06.25）。

1799-1837) 即為此一團體的活躍成員⁶⁰。

除了文學集會外，文學團體對政治氛圍也有一定看法與影響力。例如「阿札瑪斯」的成員也包括未來的十二月黨人(декабрист)，該團體因部分溫和派成員不滿集會的政治傾向而瓦解。隨後形成的「綠燈」(Зелёная лампа, 1819–1820)⁶¹，除了討論文學作品、演出戲劇外，也討論社會政治事件。

到了 1840-1850 年代，文學沙龍成為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與西化派(Западнико)論戰場所，沙龍對於貴族知識分子來說，是個不可缺少的聚會場合。例如斯拉夫派的阿克薩科(К. С. Аксаков)及霍米亞可夫(А. С. Хомяков)，的住所經常高朋滿座，討論文學及哲學問題。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為俄國文學史上的白銀時期(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此時期的文學團體繁盛。包括象徵主義(символизм)，阿克美主義(акмеизм)及未來主義(футулизм)。象徵主義具有哲學的美學理論及藝術傾向，回歸文學團體初衷，以文學創作為中心⁶²。另外阿克美派及未來派也是白銀時期對於俄國文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

⁶⁰ 成員除了普希金外，包括茹可夫斯基(В. А. Жуковский, 1783-1852)、巴鳩什科夫(К. А. Батюшков, 1787-1855)、維亞澤姆斯基(П. А. Вяземский, 1792-1878)等。參考自：Эйдельман Т.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кружки и салоны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http://www.mossalit.ru/salon-oljgi-grushevskoi/salony-v-rossii/salony-do-revoljutsii.html> (資料擷取時間：2011.06.25)。

⁶¹ 此團體由特魯貝茨科伊(С. П. Трубецкой, 1790-1860)、托爾斯泰(Я. Н. Толстой, 1908-1977)及符肖伏洛日斯基(Н. В. Всеволожский, 1793-1864)創立。成員包括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 1799-1837)及捷爾維格(А. А. Дельвиг, 1798-1831)等人。詳參：Эйдельман Т.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кружки и салоны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http://www.mossalit.ru/salon-oljgi-grushevskoi/salony-v-rossii/salony-do-revoljutsii.html> (資料擷取時間：2011.06.25)。

⁶² 象徵主義的集會例如索洛古柏(Ф. Сологуб, 1863-1927)的沙龍(Сологуба салон)、梅列日科夫斯基(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6-1941)及妻子吉皮烏斯(З. Н. Гиппиус, 1869-1945)的沙龍，還有針對宗教及哲學上的集會(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собрания)等。詳參：Белова Л. Н., Бульгаков Г. Н., Дегтярев А. Я. и др.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етроград. Ленинград: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ед., 1992. 資料來源：http://dic.academic.ru/dic.nsf/enc_sp/2307/%D0%A1%D0%B0%D0%BB%D0%BE%D0%BD%D1%8B (資料擷取日期：2011.06.25)。

的派別，「詩人、演員及藝術愛好者會在餐館、咖啡店及小型劇院中聚會」⁶³。

1920年代，布爾什維克執政的初期，文學生活仍百家爭鳴，但白銀時期許多團體已近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更趨近實驗、講究形式或是意識形態的團體。此時期的文學團體包括「為藝術而藝術」的「謝拉皮翁兄弟會」（Сер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 1921-1926）⁶⁴，團體要求建立「純藝術」，藝術必須脫離社會思想內容。「構成派」（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 1924-1930），在創作語言上要求語言必須選用較艱深的辭彙，按照此方法寫出的作品非常難懂，成員們在之後發現團體對於藝術創作的方向錯誤，進而在1930年解散。另外還有大膽前衛的「奧貝里烏」（ОБЭРИУ, 1927-1930），團體公然在成立晚會上與在場觀眾起衝突；並演出讓觀眾摸不著頭緒的戲劇。「奧貝里烏」因為不受限的世界觀，以及我行我素的處事態度，被迫停止所有公開活動。⁶⁵

在1920年代後半，許多文學團體的意識型態及政治背景越見濃厚。列夫（Левый фронт искусств, ЛЕФ 1922-1929），成員有馬雅可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等之前未來派的作家。列夫在政治上積極擁護蘇維埃政權，抨擊過去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⁶⁶ 崗位派（На посту, 1923-1925），創辦《在崗位上》（*На посту*）雜誌來進行文學活動，團體表示在文學領域裡要保衛無產階級利益，必須貫徹無產階級路線。⁶⁷ 而山隘（Перевал,

⁶³ 參考：Белова Л. Н., Бульгаков Г. Н., Дегтярев А. Я. и др.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етроград. Ленинград: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ед., 1992. 資料來源：http://dic.academic.ru/dic.nsf/enc_sp/2307/%D0%A1%D0%B0%D0%BB%D0%BE%D0%BD%D1%8B（資料擷取日期：2011.06.25）。

⁶⁴ 成員有費定（К. А. Федин, 1892-1977）、左琴科（М. М. Зощенко, 1894-1958）等人，該團體得名於德國作家霍夫曼（E.T.A. Hoffman, 1776-1822）的小說《謝拉皮翁兄弟》。小說中寫謝拉皮翁兄弟六人，各有不同的個性，以此比喻該團體的成員各有獨立的個性和主張。詳參：李毓榛，《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11。

⁶⁵ 其成員包括：哈爾姆斯（Д. Хармс, 1905-1942）、維建斯基（А. И. Введенский, 1904-1941）與札鮑洛茨基（Н. Заболоцкий, 1903-1958）等人。參考自：鄢定嘉，〈接近真理的荒誕——試析哈爾姆斯中篇小說《老太婆》的荒誕詩學〉，《俄語學報》。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第十期，2006，頁28。

⁶⁶ 「列夫」的成員提出「社會訂製」等口號。「社會訂製」曾為20年代文學界廣泛使用，許多作家都對此說法作出不同定義。「列夫」所認為的「社會訂製」是要藝術服從於生產關係的共同標準。參考：李毓榛，《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63。

⁶⁷ 「崗位派」的成員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打擊「同路人」作家或是與團體觀點不同者。蕭洛霍夫（М. А. Шолохов, 1905-1984）及法捷耶夫（А. А. Фадеев, 1901-1956）皆曾參與過團體活動。參考：李毓榛，《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12。

1923-1932)，創辦雜誌《紅色處女地》(*Красная новь*)，主要與「崗位派」對立，在許多理論上也與「崗位派」相對⁶⁸。「崗位派」打擊「同路人」作家，「山隘」則是團結「同路人」，指責「崗位派」的無產階級文化色彩。

文學團體自由興盛的時期，之後受到「拉普」(*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РАПП 1922-1932*)⁶⁹的干擾與阻撓。「拉普」為 20-30 年代蘇聯最大的文學團體，在團體宗旨上，強調宗派主義並且打擊「同路人」作家；在文學理論上，用馬克思主義代替現實主義，將藝術與政治結合。團體常常將黨的政治口號直接加於文學中，當權者得以長期壓制作家的創作理念，掌控文學發展過程與人民精神生活⁷⁰。「拉普」在創作上也反對浪漫主義，提出「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無視藝術能反映生活的特殊性。

20 年代後期的文學團體大多具有政治傾向及意識型態，甚至改為官辦。團體的目的已經違反文學團體的初衷，反而成為政權打壓作家的武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莫文聯」為 1920-1930 年代莫斯科的文學團體，它在文本中掌控莫斯科的文學發展，而「莫文聯」也被指為是對「拉普」的影射。「莫文聯」具有的官方色彩與政治意義，影響團體中的行為與思考方式，甚至能進一步引發特權性的爭論。下一節筆者將根據洛特曼及郭德曼的概念探究「莫文聯」的形象。

⁶⁸ 「崗位派」強調貫徹無產階級路線，拋棄過去的創作方式，而「山隘」則是把現實主義描寫生活看作自己唯一的傳統，以俄國和世界古典文學遺產為出發點。參考：葉水夫，《蘇聯文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 65。

⁶⁹ 「拉普」的活動時期分為兩個階段：前期以雜誌《十月》(*Октябрь*)、《青年近衛軍》(*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及《在崗位上》(*На посту*)為根據地，後期則以《在崗位上》改名後的《在文學崗位上》(*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осту*)為主要陣地。詳參：葉水夫，《蘇聯文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 67。

⁷⁰ 參考：陳茵茵，〈《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時代與文本〉，《第一屆斯拉夫語言、文學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2009，頁 64。

第二節 「文學團體」映現之行為模式與集體意識

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莫文聯」(МАССОЛИТ)的存在具有特殊意義，它除了本身具有的歷史及社會背景外，其中成員的行為表現，也能顯示這個團體的獨特性。本節將藉由洛特曼的日常生活詩學概念及郭德曼的文學社會學概念來分析「莫文聯」在成員行為及團體世界觀的特殊意義。

壹、「莫文聯」的「行為文本」分析

洛特曼認為，「日常行為在某一特定時間、地點或文化的社會中成為一個明確的研究對象。」⁷¹日常行為對於習慣使用者來說並非特別，就像母語使用者對於自小學習的語言一樣，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唯有藉由外部觀察，才能看出日常行為的美學。同樣地，外來者在面對日常行為時，也需將其視為非己身經歷之經驗，才能發現日常生活行為的特別之處。根據上述洛特曼對日常行為的解釋，我們可以藉由外部觀察，發現《大師與瑪格麗特》文本中的「莫文聯」，其成員在團體中的行為方式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本論文採用洛特曼的《十八世紀俄羅斯文化日常生活行為詩學》(*The Poetics of Everyday Behavior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Culture*)作為研究依據。對於行為解釋，洛特曼將日常行為分為兩種：第一種為某團體公認為最基本、最普通且習以為常的自然行為。而第二種則是包括所有既定的典禮或是儀式等，這個範疇中包含國家或是宗教上的儀式。⁷²第一種行為是使用者直接學習，沒有意識到自何時或何處學得，日常行為出於自然反應而無從解釋。(They are directly immersed in it through direct use and do not

⁷¹ Lotman, Iurii M., "The Poetics of Everyday behavior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Culture" in *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67.

⁷² 同上註，頁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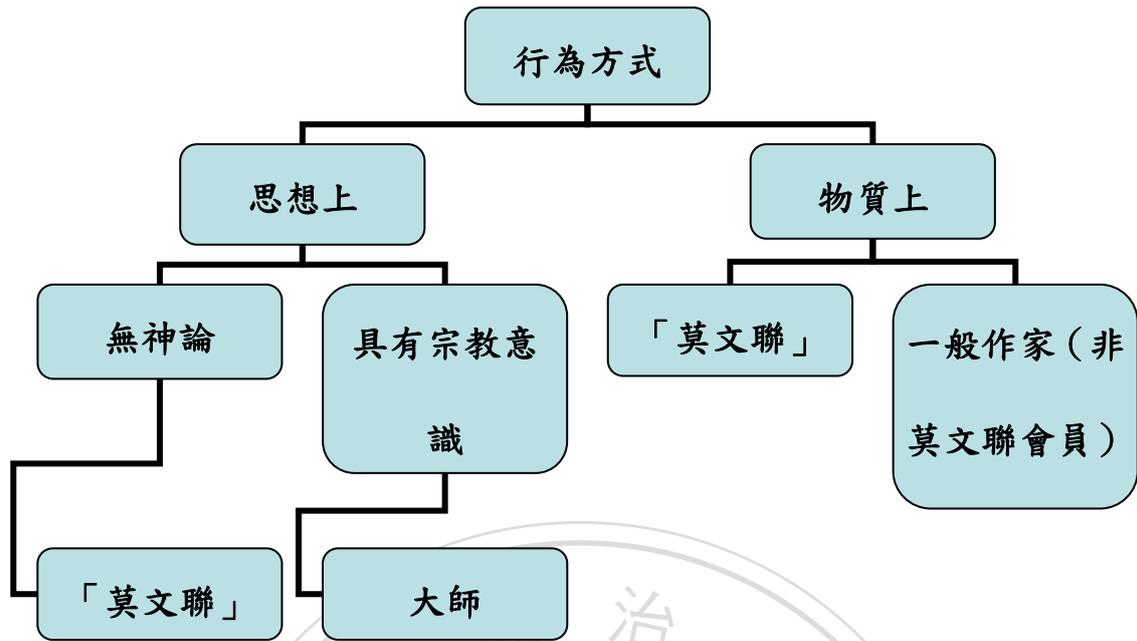
notice when, where, and from whom they acquired.)⁷³而第二種行為則是使用者經外界學得，消化吸收後表現出來，進而建立「行為文本」。(At first its norms are assimilated and then, on their foundation, “texts of behavior” are constructed.)⁷⁴

洛特曼認為第二種學習的行為模式肇因於新階段的開始，譬如新政權的出現。他以彼得大帝的統治時期為例，論述彼得的西化政策使俄國貴族經歷了社會行為的改變：他們靠後天的學習將西方的行為消化後，用仿效的方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彼得大帝的西化政策，使用一種人工的方式，將西方的行為變成俄國社會行為模式的範本。而 1920、30 年代的俄國正經歷新的歷史階段，新政權對人民進行嚴密控制，導致人民行為受到拘束。新的主流價值，使得人們必須改變自身行為，以符合社會需求。《大師與瑪格麗特》當中的「莫文聯」，反映文學團體從自由集會轉變為官方控制意識型態的工具。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中，文學家自然受到約束，表現單一與標準化的行為與思想。

為探究「莫文聯」在文本中出現的行為與思想，筆者試以洛特曼在文章中的呈現方式作說明。洛特曼運用樹狀圖將十八世紀的貴族以職業分類，說明不同職業各有其行為方式。而筆者也根據洛特曼對行為的概念，以樹狀圖表現「莫文聯」的行為方式。圖表如下（圖一）：

⁷³ Lotman, Iurii M., “The Poetics of Everyday behavior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Culture” in *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68.

⁷⁴ 同上註，頁 68。



（本圖係針對「莫文聯」中，會員與非會員在思想上與物質上的差異所製，而當時一般人民所存在的思想與物質差異則不在本論文討論範圍內。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作）

根據圖表所示，筆者將 1920、30 年代的行為模式分為思想與物質兩方面，以下將針對這兩方面分別對「莫文聯」的行為做陳述。

許多研究者指出，宗教為《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最重要的主題。⁷⁵從十世紀開始，東正教成為俄羅斯國教。上至皇室成員，下至市井小民的生老病死，皆與宗教息息相關。自十月革命後，新政權針對社會思維，以「唯物論」代替「唯心論」，並在宗教方面提倡「無神論」，嚴禁社會上進行任何與宗教相關的活動。小說以「莫文聯」主席白遼士（Берлиоз）及成員「無家漢」伊凡（Иван Бездомный）兩人的談話內容破題。他們一再強調自己為無神論者，並堅持反宗教立場。在與沃藍德化身的教授對話時，白遼士就表示不信上帝，並說明社會並沒有禁止討論這個話題：「沒錯，我們不信上帝」，白遼士

⁷⁵ 研究作品宗教議題的論文如：吳雪梅，〈《大師與瑪格麗特》人物的宗教文化闡釋〉，重慶：西南大學，2009。鍾泉，〈論《大師與瑪格麗特》的宗教思想〉，山東：山東師範大學，2008。及沈玲，〈《大師與瑪格麗特》的宗教意蘊〉，南京：南京師範大學，2005。

回答。他見外國客人如此驚恐，便微笑著補充說：「其實，這種事完全可以公開談論。」⁷⁶接著又說：「在我們蘇聯，沒有人對無神論感到奇怪。」白遼士用外交官的謙恭語調說，「我國大部分人民早就自覺地不再相信那些關於上帝的神話了。」(頁9)也就是說，蘇聯政府宣揚的「無神論」在兩位作家的眼中是普遍的社會思想。

此外，文本中行為及思想上之認同不符合標準者，則被視為異端，或令人起疑心。例如大師(Мастер)因為作品涉及耶穌及宗教議題而遭禁；「無家漢」伊凡在「格里鮑耶陀夫之家」(Дом Грибоедова)搜尋沃藍德(Волад)時，手持聖像的舉動也嚇壞在場作家，被認為是奇怪的舉止，「是啊，我拿了聖像。」伊凡的臉紅了，「這張怪像把他們嚇壞了」。(頁81)以上兩個例子皆是在社會訂製(социальный заказ)的文學語境中，不被接受的宗教意識思想與舉動。

除了宣揚「無神論」外，蘇聯時期也推崇理性的「唯物論」思想，不允許傳統的哲學思辯。白遼士否定上帝存在的論證並說：「沒辦法啊！」白遼士似乎深表同情地說，「這類論證全都毫無價值。」人類早就把它們送進檔案庫了。您大概也會同意吧！在理性的領域中不可能有任何關於上帝存在的論證。」(頁10)他對於康德的第六種論證他也嗤之以鼻：「康德的論證也同樣沒有說服力」，博學多才的主編笑呵呵地反駁說，「席勒的話是不無道理的，他說過，康德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證是只能使奴隸們滿足。而史特勞斯對這類論證則只是付之一笑。」(頁11)，伊凡聽了白遼士的說法後，也接著表示反對康德的論點，並認為：「像康德這種人，宣揚這類論證，就該抓起來，判他三年，送到索洛威茨去！」(頁11)

洛特曼接著表示，行為者在生活中不只扮演主角，也扮演了監督者，確保生活中的各層面皆按照固定模式進行。⁷⁷文本中，當白遼士與無家漢遇見沃藍德化身的教授時，

⁷⁶ 布爾加科夫著，錢誠譯，《大師與瑪格麗特》。台北：究竟，2009，頁9。以下引用僅以括號標出頁數。

⁷⁷ 參考：Lotman, Iurii M., "The Poetics of Everyday behavior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Culture" in *The*

從教授的穿著與口音猜測他的國籍，文本中兩位作家看見教授的裝扮後暗想他是德國人還是個英國人，又在聽到教授的口音時，改變了原先的猜測。兩位作家對於他人樣貌及口音的判斷方式，是蘇聯社會對外國人的既定印象：

「請兩位原諒，」來人講話帶點外國口音，但用詞倒還正確，「我們雖然素不相識，我還是不揣冒昧……因為我對兩位的高論實在太感興趣了……」來人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行了個禮。兩位朋友也只好欠身還禮。

白遼士暗自琢磨：「不，他大概是個法國人……」

「流浪漢」想：「也許是個波蘭人？」（頁8）

而在物質方面，新政權初建立，百廢待舉，人民生活艱苦，糧食與資源短缺，也難覓居所。但在「格里鮑耶陀夫之家」的作家們，無需煩惱居住地，也不用擔心生活物資匱乏。在「格里鮑耶陀夫之家」中，常常可以聽到「度假」、「美食」等等一般人民無法觸及的對話內容。例如在等待開會時，作家們抱怨白遼士遲遲未出現而展開的對話：

「這種時候待在克利亞濟瑪河畔倒不錯！」領航員明知克利亞濟瑪河畔的作家別墅村「佩列雷基諾」是誰都非常嚮往的地方，偏要刺激大家的情緒，「這個時候想必該有夜鶯啼叫了。我一般是不住在城市的時候容易寫出東西來，尤其是春天。」

「我妻子患突眼性甲狀腺腫大。為了能讓她去那個天堂療養，我從三年前就一直在繳款，現在連個影兒都沒有，」短篇小說家耶羅尼姆·波普利欣也傷心地訴起苦來。

「這種事就得看誰走運。」坐在窗台上的評論家阿巴勃科夫低沉地評論著。（頁67）

作家們為度假勝地爭論，一般人民卻連最基本的「家」都沒有，更遑論度假。而「格里鮑耶陀夫之家」餐廳當中，兩位作家的對話也表現當時作家們的物質行為：

「安姆夫羅西！你今天晚上在哪兒吃？」

「親愛的福卡，這還用問，當然在這兒。剛才阿奇霸德·阿奇霸道維奇悄悄告訴我，今晚有整條鮮鱸魚，隨叫隨燒，手藝好極啦！」

「安姆夫羅西！你真會生活！」瘦削而衣著不整、脖子後面生著個疔瘡的福卡對唇紅齒白、金髮閃亮、滿面紅光的詩人安姆夫羅西說。（頁 65）

物質上，「莫文聯」的作家們生活優渥，可以享受美食及度假生活，與一般人民生活相差甚遠，也表現出蘇聯時期官方文學團體的生活狀況。

「布爾加科夫對小說的構思，主要運用諷諧、幽默、懷疑及彼岸世界的哲學方式諷刺蘇聯當代社會。」⁷⁸「莫文聯」的兩位作家，在文本中否定上帝的存在，對「無神論」的思想深信不疑。並且對有著外國人外貌卻說流利俄語的教授產生懷疑；而在「格里鮑耶陀夫之家」當中，作家們也從對話中透露出文學團體的物質生活。根據洛特曼的概念，並利用樹狀圖的呈現，「莫文聯」成員的行為，在思想與物質上各有特殊之處，並反映蘇聯運用意識型態控制人民思想的社會情形。

貳、文學團體映現之「集體意識」與作家思維

洛特曼認為文學團體或某一社群具有相同世界觀，並且有一致性的行為與思維模式。而法國學者郭德曼從文學社會學角度出發，對「世界觀」概念有特別的解釋，他認

⁷⁸ Соколов Б. *Расшифрованы Булгаков Тайны «Мастера и Маргариты»*. —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6. с. 454.

為「世界觀」是團體意識，並強調創作個體是團體的組成部分⁷⁹，

在對「世界觀」進行定義時，郭德曼進一步衍生出「集體意識」的概念：「世界觀」不能是純粹的個體現象，藉由相當數量的個人構成了一個社會集團，這種「世界觀」的定義構成了集團的「集體意識」。⁸⁰

郭德曼指出，文學作品中的情節，反映社會現實，並與作品中某一特定具有集體意識的團體產生聯繫，出現一種特權性與批評性。⁸¹所謂特權性，是作品描寫的團體成員組成一個連貫結構的集合體。此集合體與社會上具有特權的集團相似。根據郭德曼的概念，「莫文聯」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為蘇聯 1920、30 年代的文學團體，受到政府的意識型態影響，是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而團體的物質生活也較一般人民優渥。因此，綜合團體的政治背景與日常生活狀況，「莫文聯」在蘇聯時期的特殊歷史環境中，可能產生特權。

在文本中對「莫文聯」的描述，例如白遼士個人所住的花園街私宅，在 1920-30 年代的莫斯科，非一般人能擁有，普通人民只能住在擁擠的公共住宅。唯有黨幹部或是為黨做事的特權階級，才有可能獲得個人居住空間。另外，「格里鮑耶陀夫之家」不僅外觀引人注目，「莫文聯」在其內部的單位也無奇不有，「釣魚度假組」、「全包制創作假期」等等，顯示成員休閒娛樂的多樣性。而在文本中對於「格里鮑耶陀夫之家」的描述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餐廳的設置：

姑母這座小樓下層還開了間「格里鮑耶陀夫餐廳」呢！多好的餐廳啊！

它當之無愧地被譽為莫斯科最佳餐廳。不僅因為他很有氣魄，佔著兩個圓屋頂大廳，大廳的拱形天花板上畫著千姿百態的古代亞述式鬃毛的淡紫色駿馬；不僅因為這裡每張餐桌上都放著一盞蒙著輕紗的檯燈；也不僅因為這個

⁷⁹ 塔迪著，史忠義譯，《20 世紀的文學批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頁 188。

⁸⁰ 呂西安·郭德曼著，段毅、牛宏寶譯，《文學社會學方法論》。北京：工人出版，1989，頁 66。

⁸¹ 同上註，頁 21。

內部餐廳不是隨便什麼都可以走進來的；而且還因為這個餐廳的菜餚確實物美價廉——質量勝過莫斯科任何一家大飯店，而價錢又最最低廉的，那幾個錢根本算不了什麼。(頁 64)

對於當時的社會來說，「格里鮑耶陀夫之家」是人人稱羨之地，建築中的「莫文聯」成員，除擁有社會地位外，日常生活上的優渥也可想而知，山珍海味（銀鍋燒鱈魚、松露、魚子醬等）在「格里鮑耶陀夫之家」卻如同家常小菜。因此，「任何一個來訪者，踏進格里鮑耶陀夫之家後的頭一個想法必然是：這些幸運兒，莫文聯的會員們，生活得多好啊！……」(頁 64)

除了文學作品中的集團具有特權性的論點外，郭德曼也認為社會團體為文學作品的中心，作者藉由描寫社會團體衍生出更多的形式與內容，並帶動情節發展。他表示：「文化創作的真正主題是社會團體而非孤立的個人」⁸²，他的重點在於小說中的團體與作者及社會的關連性。根據郭德曼的說法，作品中的文學團體能夠反映社會現象。

「莫文聯」在文本第四章，「無家漢」伊凡為了追捕沃藍德，來到了一間住宅，當時他不知原因，就下意識的將住宅廚房中的聖像拿走，「誰也說不清伊凡當時是怎麼想的，反正他從神龕後偷出一支蠟燭，摘下了那張紙聖像，拿著這些東西從後門離開了那間不知是誰家的住房。」(頁 59) 當時的蘇聯政府控制人民思想，「無神論」深植人心，因此，「無家漢」認為紙聖像的存在不被接受，才会有如此舉動。此外，在「無家漢」追捕的過程中，文本描述：「……所有窗子裡的電燈上都是橙黃色燈罩，從所有的窗戶裡、門裡、門洞裡、屋頂上、頂樓裡，從所有地下室和院落裡，傳出來的都是同樣嘶啞的歌劇《葉甫蓋尼·奧涅金》中波蘭舞曲的轟鳴聲。」(頁 60) 及「在整段艱難的路程中，收音機裡傳出的樂隊演奏聲一直伴隨著他，他到處都聽到同一個凝重的男低音在樂隊伴奏下傾訴對塔吉雅娜的愛情。」(頁 61) 兩段引言皆表現出蘇聯時期人民不只在思

⁸² 塔迪著，史忠義譯，《20 世紀的文學批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頁 188。

想上受控制，連日常生活使用的收音機，也必須統一收聽政府規定的內容。

布爾加科夫除了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以「莫文聯」為中心描寫反映蘇聯社會現實的情節外，也在文本中加入了自己的批判。針對「莫文聯」，布氏利用文本中的角色來闡述自己對文學團體在思想與行為上的否定，例如在最後卡羅維夫（Коровьев）與黑貓「河馬」（Беремот）來到「格里鮑耶陀夫之家」時，對這棟樓的評論：

「是的，這座小樓的溫室可望產生一些驚人的巨著，因為這裡集中了幾千個有獻身精神的人，他們都決心無私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獻給墨爾波墨涅，波呂許漢尼亞和塔利亞的事業。」

「當然，那還用說！」「河馬」又立即表示同感。

「是這樣，」卡羅維夫說著，卻同時憂心忡忡地舉起一個手指，把話鋒一轉說，「然而！我是說『然而』，而且還要再重複一遍這個『然而』！這是說假定這些嬌嫩的溫室植物不受到什麼微生物的侵襲，它們的根不被微生物蛀蝕掉，假定它們不爛掉的話！而溫室裡的波羅恰恰是常常發生這爛根情況的！哎呀呀，常常發生呀！」（頁434）

這段對話表面看來，是卡羅維夫與黑貓「河馬」評論「莫文聯」成員資質的與未來，事實上不難看出是布爾加科夫對這些作家的看法。他將作家比作溫室植物，而「莫文聯」的腐敗現象則為微生物，將會破壞作家的創作思維。在另一段對話中，卡羅維夫與黑貓「河馬」被要求出示會員證，也表達出布爾加科夫認為當時的文學團體只看重作家成員身分，反而忽略作家本身的創作力與天份：

「噢，那太遺憾了，」卡羅維夫表示失望，然後又說，「那好吧！既然您覺得不便做個可愛的女士，那您可以不作，儘管當個可愛的人是件很值得高興的事。那麼，請問，難道為了相信杜思妥也夫斯基是作家，還需要檢查一

下他的證件嗎？您可以從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隨便抽出任何五頁來看看，您就會馬上相信那是一位真正的作家的作品，無需檢查什麼證件！」（頁 435）

在當代社會，文學團體的成員身份，直接決定作家的創作道路是否順利。文本中卡羅維夫說道：「一個人是不是作家，絕不是由證件決定的，而是由他所寫的東西決定的！」（頁 436）也表現布氏對成員身份影響作家命運的不認同。因作品被控影射政府，布爾加科夫的創作之路受阻。在第一章筆者提及布爾加科夫的住家遭到搜索，作家本身卻無能為力。儘管史達林曾經下令恢復布爾加科夫戲劇的演出，但也只是曇花一現。在蘇聯統治下的作家一旦遭指控，就很難有在文學界生存的空間。

此外，布氏筆下的「莫文聯」是反映當代社會的文學團體，雖成員表面皆有一致的行為與思想，但成員內心的個人思維卻各有不同，例如「莫文聯」主席白遼士在死前始終堅持無神論的政治立場，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沃藍德運用「第七項論證」（седьмо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證明人無法以個人意志掌控生命，此時瀕死的白遼士，腦中浮現台詞：「難道果真如此？」（頁 52），他未能思考自身思維是否錯誤就離開人世。

在文本第六章，另外一位「莫文聯」成員柳欣（Рюхин），送伊凡去精神病院後，伊凡指責他：「……你們看他那副愁眉苦臉的倒楣相，再和他寫的那些響亮的〈五月一日〉獻詩比比看！嘿，嘿……什麼『飄揚呀！』什麼『招展吧！』……可是你們再看看他的內心，看看他在想什麼……」（頁 79）柳欣雖感到生氣，事後卻認為伊凡說的話「的確包含真理」（頁 85）。柳欣自問自答地說：「就因為我寫的那些東西，我自己也一點都不信……」。（頁 85）雖然柳欣對於伊凡所說的道理產生動搖，但他仍被動的接受一切：「一刻鐘之後，柳欣孤零零地佝僂著身子坐在餐桌旁，盯著眼前一盤小魚，一杯接一杯地往肚裡灌酒。他明白，而且承認：他已絲毫無法改變自己的生活道路了，他所能做的只有忘卻。」（頁 86）

而「無家漢」伊凡起初與白遼士的思維相同。當沃藍德詢問兩位作家人生應由誰主宰時，「無家漢」直接回答，但他其實對問題沒有深入了解：

來歷不明的外國人閃著一隻眼睛繼續說：「不過，有個問題我還是不明白：如果說沒有上帝，那麼，請問，人生由誰來主宰，大地上萬物的章法由誰來掌管呢？」

「人自己管理啊！」「流浪漢」怒氣沖沖地搶著回答，其實，他對這個問題也並不很清楚。(頁11)

上述對話發生時，「無家漢」仍堅持政府的「無神論」立場，但最後一句「並不是很清楚」透露的是：作家沒有獨立思考，只是遵照社會普遍思想做反應。在見證了「第七項論證」，白遼士也的確依照沃藍德的說法死去後，「無家漢」為之駭然，並對自己的看法產生懷疑。「無家漢」進入精神病院後遇到大師，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在小說第三十章，大師前來辭行，「無家漢」對大師表示他明白了許多道理：

伊凡喜形於色地說：「您特地來看我，太好了。您知道，我是信守諾言的，我再也不寫詩了。現在我已經對別的東西發生了興趣，」伊凡微微一笑，兩隻呆痴的眼睛越過大師望著遠處什麼地方說，「我想寫點別的。您知道嗎，我躺在這裡靜養期間明白了許多許多道理。」

大師聽到這些話異常激動，便坐到床邊對他說：「噢，這很好，這很好！那您就寫一部關於他的續篇吧！」

年輕的伊凡的眼睛裡燃起了火焰。(頁461-462)

筆者將上述團體中的三人做比較，白遼士未對自己的想法深思就死去，但死前他仍堅持自身的立場；柳欣對自己的創作及未來感到懷疑，卻只被動接受一切。「無家漢」伊凡最初堅持社會普遍思想，在見證白遼士的死、遇見大師後了解真理，改變了他的創

作道路。三人的發展描述也是布爾加科夫在《大師與瑪格麗特》所做的安排，也試圖用三人來表現當時的文學團體，雖具有一致的思想與行為，其個人思想變化及結局卻不盡相同。

「莫文聯」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特殊意義，無論是在思想上或物質上，都表現出政治意涵及當代文學團體的生活面貌。團體思想與行為一致化下，出現「集體意識」，且具有特權性。「莫文聯」反映當代社會現象，並傳達布爾加科夫的自身思維及其對文學團體及社會的批判。



第三節 團體與個人衝突的思考——論大師的命運

《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大師所寫的作品遭到「莫文聯」大加撻伐，他選擇住進精神病院，這表示「莫文聯」的身分地位能夠主導社會上的文學作品，這個文學團體的本質已經改變，成為集地位、優勢與權力於一身的綜合體。「莫文聯」在文本中的「團體」角色與大師「個人」形成對比，出現「團體」與「個人」之間的衝突（конфликт），而這個衝突中也牽涉「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意義，本節主要闡述兩者之間的衝突，及衝突出現的原因與帶來的結果，並且對於「文化霸權」及「權力」做進一步的解釋與分析。

壹、由「莫文聯」產生的「文化霸權」

「文化霸權」為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發展出來的一種理論思想。近年來此概念被人廣泛討論，有人將此概念當作是分析的手法，解析各種主義的影響，也有人將此概念看作策略，研究取得政權的可能手段。⁸³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所指涉的內容涵蓋甚廣，如：集體意志的形成、知識份子和黨的角色、政治教育的藝術、政治鬥爭的策略、國家統治的藝術和「文化霸權」過去歷史經驗的反省等等。葛蘭西從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進一步將「霸權」觀念引入文化和意識型態研究領域，葛蘭西認為在文化中的「霸權」作為實踐體驗的價值中心體系，是人對其世界的性質的普遍理解。」⁸⁴表示「霸權」在文化中，為具有價值意義的中心，人普遍認同此中心的概念。

⁸³ 波寇克著，田心喻譯，《文化霸權》。台北：遠流出版，1991，頁1。

⁸⁴ 王逢振，《文化研究》。台北：揚智文化事業，2000，頁35。

除此之外，葛蘭西也主張「霸權」體制並非永恆的秩序，要確認意識型態的存在，才能穩定「霸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或與階級派系的聯盟所提供的知識、道德和哲學的領導成功地達成「為整個社會提供基本看法」的目標時，就產生了文化霸權。⁸⁵因此，「文化霸權」的重要性，就是要在文化上確立意識型態，並用它來控制社會。

葛蘭西還在「文化霸權」的概念中將市民社會比作「對社會具有影響力的團體」，市民社會代替國家在社會中傳達意識型態，並進一步將市民社會與國家政治做結合，形成「完全的國家」(integral state)。根據他的論述，「完全的國家」是「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它包含兩層面：強制的手段及市民社會建立的文化霸權，包括教育、出版方面等等。若要成為「完全的國家」，就必須在文化上出現具有領導性的團體。

《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描寫的莫斯科，係由史達林統治時期為背景，國家具有強制的手段能力，並且在市民社會的建立上，藉由團體「莫文聯」統一管理文學相關事務，且「莫文聯」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表達政府的意識型態，因此，「莫文聯」的社會定位及功能與葛蘭西「文化霸權」的概念有一定的相關性。

「莫文聯」因時勢成為「文化霸權」，依照政府的政治思維控制並迫害作家，進而與反對者產生衝突。「莫文聯」在當代社會中，具有地位且擁有權力，「權力」導致社會中出現加害者與受害者兩種不平等的關係，因此，筆者要進一步利用「權力」來分析「莫文聯」產生的「文化霸權」如何對迫害弱勢者。

加爾布雷斯認為(John Kenneth Galbraith)社會上具有三種方式能夠獲得權力，它們是人格、財產和組織。⁸⁶

⁸⁵ 波寇克著，田心喻譯，《文化霸權》。台北：遠流出版，1991，頁83。

⁸⁶ 加爾布雷斯著，劉北成譯，《權力的剖析》。台北：時報文化，1992，頁37。

在人格方面，具有社會地位與聲望的人格，通常成為人們崇敬的對象，「莫文聯」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團體能夠操控文學出版與作家的未來。1920、30 年代的文學團體多少都帶有政治色彩，政府所賦予的權力加於團體中，造成人格地位的誇大，團體成員被讚揚，致使人格在地位上的提升，「莫文聯」中的白遼士與批評家拉銅斯基在文本中並沒有任何能夠證明其文學內涵的描述，而只是因為兩者的頭銜、名氣與聲望，所以能操控權力，此點可論證「頭銜」的意義大於個人本身的能力。

在財產方面，金錢代表對社會上的影響力，財產與人格實際上具有密切關係，當一個人具有社會地位的人格，其財產也會提升，但有財產並不能證明一個人的聲望是否實至名歸，在「莫文聯」所屬的社會中，一旦具有聲望，財產則隨之而來，團體成員擁有一般人不能擁有的獨戶住宅與休閒度假權利。因此，財產也成為權力的一種表現方式。

最後為組織方面。任何集體範疇，任何階級、任何群體本身都沒有權力或不可能行使權力。必須有另一個因素出現，這就是組織。⁸⁷組織中的成員具有人格與財產上的條件，組織作為一個權力來源也需要「內外對稱」。對內，包括成員的價值意識一致，贏得對內部的服從，而對外則需要對內的服從一致後，才能產生強大的權力。本中的「莫文聯」對內的價值意識來自於政府的思想，內部的共同理念相對提高，在文學界產生的影響力就更大。

上述筆者說明獲得權力的三種途徑，「莫文聯」在當代社會的背景下，自然能擁有人格、財產及組織三方面的優勢。這也表示，在蘇聯時期，若不受政府支持與認同，勢必成為弱勢。權力的不平等關係，進而形成「莫文聯」與大師的衝突。

⁸⁷ 加爾布雷斯著，劉北成譯，《權力的剖析》。台北：時報文化，1992，頁 51。

貳、《莫文聯》與大師的衝突

在人與人的相處中，可能會產生「衝突」，而衝突也成為怒氣宣洩的出口，包括爭吵、決鬥、戰爭等等，皆是衝突的表現方式。「衝突」的概念存在不同的解釋，如「衝突是一連串的動態過程，每個衝突都是由一連串相關衝突事件組合而成。」⁸⁸或是「衝突也是一種情境，當個體或群體無法在對立或不相容的目標方向間做確切抉擇時，陷於焦慮、緊張或不安的狀態。」⁸⁹，另外也有人認為「衝突是指兩方或兩方以上的成員、群體或組織間，由於知覺到彼此不相容的差異，而導致的異議與對立。」⁹⁰

綜合以上對於衝突的定義解釋，我們可以將衝突看作為兩個以上的主體，在觀念與認知上的不同，造成個人與外在的緊張情緒，進而產生動態的反抗過程。而在文學中，衝突（конфликт）通常發生在人與人、人與環境及人與命運之間。⁹¹在極權統治的蘇聯文學中出現「無衝突論」（теория бесконфликтност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的活動中，不允許不實際的「衝突」存在，只有「好與更好的衝突」（конфликт хорошего с лучшим）。⁹²這表示在蘇聯時期，文學作品只能存在宣揚共產主義或是描寫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抗的「衝突」。這個理論成為作家寫作的依據，具有「無衝突論」的作品，例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⁹³，書中描寫革命者在鬥爭中百煉成鋼，也表明人須在革命中戰勝自己，並將自己與祖國及人民利益連在一起，才能創造奇蹟。作品宣揚革命，並且表達與祖國共進退的思想，這類符合「無衝突論」的作品在蘇聯時期受到重視。

⁸⁸ 此概念引自：Pondy L. R. *Organization conflict: Concepts and Mode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12, 1967, p. 296.

⁸⁹ 黃曬莉，《中國人的人際和諧與衝突：理論建構及實徵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120。

⁹⁰ 林建煌，《管理學》，台北：智勝文化事業，2001，頁 419。

⁹¹ Николукин А. Н. (ред.)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М.: НПЦ «Интелвак», 2001. с. 392.

⁹² 同上註，頁 393。

⁹³ 作者為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Н. А. Островский, 1904-1936），曾為蘇聯作家協會會員。

《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產生的衝突，違背了「無衝突論」的內容，作品包含了對蘇聯社會的諷刺、違反「無神論」的宗教元素；而主角大師與「莫文聯」的衝突，也反映文學團體迫害違反主流意識作家的事實，這些皆是《大師與瑪格麗特》在當時被禁止出版的原因。

如前所述，「莫文聯」因政治背景所取得的社會優勢與地位成為對個體造成壓迫的衝突原因。然而大師所面對的衝突，除了外在與「莫文聯」發生的衝突外，還包括大師在自己扮演的角色上所產生的內在衝突。

在分析「文化霸權」及權力時我們得知，在蘇聯社會受到政府的支持就可能獲得權力。而權力在理論上也具有「衝突論」，強調權力是以支配型式（form of domination）出現，並認為由一團體施加於另一個體上的統治結構是必然發生之社會存在。當不同單元（人或團體）間彼此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很少有不分勝負的情形。被治的一方雖可能不願意接受，但受限於實力（挑戰的資源）無法作有效的反抗，只能選擇屈服。⁹⁴因此，大師對外與「莫文聯」的衝突必然發生，特別是在蘇聯社會下，人民必須絕對地服從，政府的權力則無限制，而身為政府思想宣傳的代表——「莫文聯」——具有政治背景，自然成為與大師衝突上的勝利者。

大師的內在衝突分為兩個層面：角色衝突與精神衝突。他同時扮演作家與情人的角色，身為作家的角色遭到「莫文聯」否定，作品也無法出版；另一方面，身為情人，面對瑪格麗特的自責，大師也無法處理，「我心上人的變化也很大。她消瘦了，臉上失去血色，還一再請求我原諒她，因為是她勸我發表小說片段的。」（頁 177）由此看來，大師無法同時兼顧兩種角色。在精神衝突方面，大師作為一名文學作家，在寫與不寫中掙扎，面對文學家與批評家的批評，大師從原本「雙手捧著這部小說進入了生活」（頁 173），但結果卻變為「同時我的生活也就宣告結束了。」（頁 177）

⁹⁴ 賴特·凱勒著，林義男譯，《社會學》（上）。台北：巨流，1997，頁 419-420。

因為作品無法被世俗眼光所接受，報紙上對於大師作品的批評文章日益增多，大師的心靈遭受前所未有的折磨，導致到了最後大師「進入了一種心理病變的階段」（頁177）：

「躺下的時候我只是病恹恹的，這時醒來已經完全是個病人了。我忽然覺得晚秋的黑色就要擠破窗玻璃，湧進屋裡來，我將在這黑暗中，就像在墨水裡一樣被噏死。我覺得自己已經無法控制自己。我大叫一聲，忽然想跑出去找個什麼人，哪怕到樓上去找房東也好。我瘋狂同自己搏鬥，鼓足力氣總算掙扎到了暖爐前，點著了爐裡的劈柴，劈柴劈劈啪啪地著了起來，震得爐門咯咯響；我感覺好多好些了……」（頁178）

大師一方面受到外在（莫文聯）所給予的壓力。另一方面，身為作家與情人的衝突，也帶給大師在心靈上的折磨與痛苦，種種原因使他捨棄了一切，住進精神病院，「我放棄了生活中的一切，也同樣放棄了自己的姓氏。忘掉它吧。」（頁167）

大師因角色與精神衝突選擇進入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為蘇聯統治時期控制人民思想的有利工具，舉凡與黨之意見與思想相異者，皆有可能成為精神病院的長期住民。蘇聯政府控制人民的方式包括強化意識型態宣傳和控制、逮捕入獄、住進精神病院及驅逐出境。其中的精神迫害為蘇聯史上最醜惡的一幕。⁹⁵精神迫害的方式例如將對政府不滿或是想法不切實際的人，直接宣布為精神患者。這些被政府送進精神病院的人，不顧其本人和家屬的反對強行關入精神病院，從而迫使受害者放棄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而所謂「想法不切實際」是蘇聯統治當局單方面的定義，人民往往無法為此辯駁。在文本的第十三章中，大師向伊凡表示：「我這病治不好，史特拉汶斯基總說他能夠使我回到生

⁹⁵ 沈志華主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71-1991）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1015。

活中去，但我不相信他。他是仁愛為懷的，只是用這話安慰安慰我罷了……」（頁 182）大師的病無法治癒，表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他的思想不被接受，其著作也因具有宗教意識，成為遭文學界定義的「不切實際之人」，大師無法自精神病院離開，更遑論返回正常的社會生活。

而面對角色與精神上的衝突，大師並沒有為自己的衝突進行宣洩，瑪格麗特成為大師衝突宣洩的替代者，根據齊美爾（Simmel Georg）的安全閥理論（safety-valve theory），敵對情緒在行為中的相應表達，至少有三種可能的類型：1. 對作為挫折源的個人或群體直接表示敵意。2. 這種敵對行為指向替代目標。3. 可以提供滿足感的釋放緊張狀態的活動本身並不需要對象或替代對象。⁹⁶瑪格麗特在文本中因為痛恨扼殺大師作品的批評家拉銅斯基，但又無法接近對象本人，在針對原本對象的衝突行為被阻止的情況下，敵對的情緒轉移至替代目標，她砸毀了拉銅斯基的住家，這個住家成為瑪格麗特宣洩情緒的對象。

瑪格麗特在文本中利用間接的方式代替大師宣洩情緒，處理大師與「莫文聯」的衝突。然而，這些方式都是布爾加科夫魔幻手法的一部分，在現實的蘇聯當代社會中，面對政府無盡的統治權力，面對世俗社會看待的眼光，大師與「莫文聯」的衝突，個人的那一方勢必成為與團體產生衝突後的失敗者。而最後大師的命運，如果不是在文學作品中，也不可能得到「安寧」，反而注定在精神病院抑鬱而終。

⁹⁶ 科塞著，孫立平等譯，《社會衝突的功能》。台北：桂冠，1991，頁 33。

第四節 小結

筆者在本章第一部份介紹文學團體在俄國的發展。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莫文聯」是理解 1930 年代俄國文學生態的關鍵。在分析文本中的「莫文聯」前，必須了解文學團體在俄國的發展背景。

西方早在十六世紀就已出現沙龍，而沙龍與文學團體的功能與性質各有不同。文學團體成員主要因為共同創作理念或世界觀而聚會，彼此間相互提攜。俄國從十八世紀 30-40 年代陸續出現文學團體，其活動並不侷限於文學討論。十九世紀重要文學團體包括「俄羅斯語言愛好者會議」與「阿札瑪斯」，除了文學集會外，文學團體對政治氛圍也有一定看法與影響力。到了 1840-1850 年代，文學沙龍成為斯拉夫派與西化派論戰場所。而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白銀時期的文學團體包括象徵主義，阿克美派及未來派。

1920 年代，布爾什維克執政的初期，文學生活仍百家爭鳴，其中團體包括「謝拉皮翁兄弟會」、「列夫」及「奧貝理烏」等等。20 年代後期的文學團體大多具有政治傾向及意識型態，已經違反文學團體的初衷。

接著，筆者在第二節以洛特曼及郭德曼的概念分析「莫文聯」的形象。1920、30 年代的俄國正經歷新的歷史階段，新政權對人民進行嚴密控制，導致人民行為受到拘束。《大師與瑪格麗特》當中的「莫文聯」，反映文學團體從自由集會轉變為官方控制意識型態的工具。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中，文學家自然受到約束，表現單一與標準化的行為與思想。為探究「莫文聯」在文本中出現的行為與思想，筆者將團體行為分為思想及物質兩方面，試以洛特曼的概念，並搭配樹狀圖作說明。在思想上，成員一致認同「無神論」，並用對外國人的既定印象判斷他人。而物質上，成員享受優渥生活，對話的主題是美食與度假勝地。

筆者另外也利用法國學家郭德曼的「世界觀」概念分析團體的「集體意識」。郭德曼認為：「世界觀」不能是純粹的個體現象，藉由相當數量的個人構成了一個社會集團，這種「世界觀」的定義構成了集團的「集體意識」。郭德曼提出文學作品中的集團具有特權性，而文本中的「莫文聯」住房環境與財產非普通人所及。另一方面，郭德曼也認為社會團體為文學作品的中心，作家藉由作品中的團體反映社會現實與自身思維。布爾加科夫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描寫「莫文聯」產生的社會現象也是抒發自己的心聲，表示對當代社會文學團體的行為無法苟同。

最後，在第三節筆者首先以「文化霸權」的概念分析「莫文聯」的權力地位。「莫文聯」在當時成為社會上壓制作家的最大原因，絕對的地位優勢來自於政權賦予的權力，團體運用人格、財產與組織這三種獲得權力的方式來剷除異己，大師與「莫文聯」產生「個人」與「團體」間的衝突，成為「莫文聯」權力底下的犧牲者。另外，筆者也在本節介紹蘇聯時期「無衝突論」的內容，進一步分析大師與「莫文聯」衝突後的內心掙扎與矛盾。大師與「莫文聯」產生的衝突，在蘇聯社會環境與官辦團體的權力運用下，「莫文聯」必定取得勝利。

第三章 映現當代生活——《大師與瑪格麗特》中「住房問題」的探討

「住房問題」(квартирный вопрос) 在 1920-1930 年代的莫斯科是社會現象，也是社會問題。在布爾加科夫的作品中，「住房問題」也一直是重要的描寫對象，布氏對於「住房問題」的描寫，不僅是反映作家本身的生活，也反映了當代社會出現的空間分配問題。《大師與瑪格麗特》描繪了莫斯科權力擁有者的獨戶住宅及一般人居住的公共住宅景色。在文本中，「莫文聯」主席白遼士的住房在他死後引發一場住房爭奪戰，因為在莫斯科要獲得住房，實屬不易。雖在當代社會，人民難以獲得居住空間，但擁有在權力上的身分與地位者卻能得到豪華的住宅，甚至擁有別墅，這點出了「空間」與「權力」兩者之間的關係。本章首先分析《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出現的「住房問題」，再進一步闡述白遼士的住房引發的空間與權力關係。

第一節 1920-1930 年代俄國首都的「住房問題」

1920 至 30 年代，想在莫斯科擁有一套住房，可謂難上加難。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掌權，隨後的內戰造成人們流離失所，大量的人口湧進城市中尋找工作與生存之地，人民的居所成為一大難題。根據統計「1925 年每月排隊等待住房的人數是 2.7 萬人，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超過五十到六十人。」⁹⁷「公共住宅」(коммунальная квартира，簡稱 коммуналка) 為因應居住空間上的缺乏而產生，出現幾戶居民集體居住的狀況，人民分配到的空間狹小，環境擁擠且髒亂。儘管公共住宅的生活條件差，但城市中的空間有限，並非所有人民都能獲得公共住宅的居住權，城市的住房依舊短缺，進而引發「住房問題」。

⁹⁷ 參考自 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 (20 – 30-е годы)*,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3, с. 439.

莫斯科在 1919 年開始成立工人住房公社，大花園街 10 號是第一個住房公社，將日常生活最大限度的社會化。⁹⁸布爾加科夫曾經居住過公共住宅，而他的居所就是大花園街 10 號樓 50 號房的居住地，在布氏的作品中，這個住所成為「不吉祥的房子」(нехорошая квартира)，並且在同名的小品文及《大師與瑪格麗特》皆可看到這個住所出現的身影。對於這個住所，芭婭吉涅娃(Л. Бояджиева)描述到：「這裡在革命後成為有組織性的居住地，公寓的最先擁有者已經搬離，獨戶居住的公寓模式轉變成集體居住系統——房間的居住者基本上是工人——那些低文化水平的酒鬼，在公寓的 50 號住著布爾加科夫及其他五個家庭，其中也包含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打翻葵花子油讓白遼士慘死電車下的安奴什卡(Аннушка)。」⁹⁹

布爾加科夫在作品《20 年代的莫斯科》，標題名為「住宅問題」的章節中也對公共住宅的環境有深刻描寫，布爾加科夫首先提到「住宅」在莫斯科的本義已經消失，隨便一種東西都可以稱作「住宅」，接著布氏寫出了集體居住環境與令人厭惡的「鄰居」：

其實論門我只有扇，論房我也只有一間。而且那扇門是直通走廊的。斜對門還住著一位有名的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和他那有名的妻子。實話對你們說，此人在任何一套住宅裡都會把生活搞得一團糟，事實也的確如此。他的一舉一動無不同身邊的人作對，共和國的法典沒有一條沒被他破壞過。破口大罵下流話不好不是？可他就偏偏要罵。酗酒不好不是？可他偏偏要拼命灌。耍流氓允許嗎？不允許。可

⁹⁸ 沈志華主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71-1991）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232。

⁹⁹ 參考：Бояджиева Л. *Москва Булгаковская*. М.: Астрель: Олимп, 2009. с. 82.

他偏偏要耍。」¹⁰⁰

接下來布爾加科夫描寫出與集體居住環境形成強烈對比的獨戶住宅，兩種環境給人一種矛盾的感覺，好像在同一個城市中，存在不同的國度：

就比如說吧，喏，濟娜的住房條件就很不錯。不知用什麼辦法在莫斯科市中心搞到了一套不小的住宅，三個房間，裝修一新。有衛生間，有電話，還有丈夫。馬紐什卡在煤氣爐子上煎肉餅，這個馬紐什卡也有個單獨的房間。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四個房間，三口人。一個外人也沒往裡插。¹⁰¹

布爾加科夫在這兩段文字中清楚表現莫斯科存在的兩種居住環境，也清楚描述了當時莫斯科的居住生態。布氏運用親眼所見將社會現象描繪出來，作品也就反映了作者與社會的相互關係。

在文學社會學的研究中，社會與文學作品間的關係成為主要研究對象，社會是經由作家的描述，在作品中反映出來。文學社會學家喬治·盧卡奇（George Lukacs）認為文學既是表現手段又是宣傳手段，因為人「與歷史和社會的構成因素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有機關係。」¹⁰² 盧卡奇也認為，作品中的人物並非是作者捏造，其人物反映的是社會現實，這些人物表達了作者本人「世界觀」，作者藉由他們緊緊抓住時代的重大問題，無情地再現社會現實真正的本質。¹⁰³

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布爾加科夫利用多個情節與對話描述出當代社會

¹⁰⁰ 布爾加科夫著，徐昌漢譯，《莫斯科——時空變化的萬花筒》。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96。

¹⁰¹ 同上註，頁101-102。

¹⁰² 塔迪著，史忠義譯，《20世紀的文學批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頁178。

¹⁰³ 同上註，頁179。

「住房問題」的迫切性與嚴重性。例如第五章「在格里鮑耶陀夫之家」寫道：「有一扇門的牌子上寫著「住房問題」。這個門前的隊伍最長，一直排到樓下傳達室。這裡每秒鐘都有人拼命往門裡擠。」（頁 63）這句描述突顯「住房問題」成為生活在莫斯科的人民最重要的問題。接著，作家還主動刻畫眾人在「莫文聯」主席白遼士的死後，動手搶奪其住宅的情況：

白遼士的死訊以神奇的速度傳遍全樓，於是，從第二天清晨七點開始，博索伊（即尼卡諾爾）家的電話就響個不停了。接著是許多人親自登門遞交要求占用死者住房的申請。兩小時內博索伊家共接到這類申請書三十二份。

申請書內容包括：祈求、威脅、中傷、告密、自費修繕住房的許諾、現有住房擁擠情況的描述，以及「不能在和土匪們住在一起」的理由等等。其中一個住在第三十一號住宅的人在申請書中以驚人的藝術技巧，描寫了他裝在上衣口袋裡的肉餡餃被偷走的情形，有兩個人以自殺相威脅，還有個女人如實地坦承自己已非法懷孕而不得不申請住房。

尼卡諾爾·伊凡諾維奇一再被喚到前廳，大家拉著他的衣袖懇求，在他耳邊小聲嘀咕，對他擠眉弄眼地暗示，提出絕不會忘恩負義的保證……。（頁 112-113）

自白遼士死後，人們以飛快的速度遞交申請，無所不用其極，甚至編造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理由，為的是要得到白遼士死後的住房。另外，白遼士的姑父也為了接收內侄的住房，從基輔一路來到莫斯科：「莫斯科來電使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精神大振。白白錯過這樣的機會，簡直是作孽！在社會上混事的人都明白，這種機會千載難逢」（頁 239-240）、「老謀深算的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明白，首先必須走的第一步棋是：無論如何要在內侄的三間住房裡報上戶

口，哪怕是臨時戶口。」(頁 240) 種種描述，突顯在莫斯科取得一個住房空間，是多麼不易，特別是白遼士的住房，在當時並非一般人能擁有。

獲得住房的困難度促使莫斯科人民出現「告密」的現象，不惜舉發他人來獲取政府信任，也有機會獲得住房獎勵，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莫加雷奇告發大師寫了違反當代社會思想的作品，因此獲得他的住房所有權：

「你叫莫加雷奇？」

「是，我是阿洛伊吉·莫加雷奇，」那人戰戰兢兢地回答。

「你看過拉銅斯基批判這個人的小說的文章之後，便寫了封告密信，說這個人家裡私藏非法書刊，對不對？」阿札澤勒又問。

掉下來的人嚇得臉色發青，痛哭流涕表示悔過。

「你就是為了占他那兩間地下室吧？」阿札澤勒低聲低氣地用盡可能溫和的口吻問。(頁 357)

在莫斯科，一般民眾想盡辦法在城市求得一席居住之地，由於僧多粥少，能夠達到目的者寥寥無幾。當時普遍的居住環境是擁擠的公共住宅，任何人都想自生活條件極差的環境中跳脫。對於公共住宅的景象描寫，布爾加科夫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寫到「無家漢」伊凡在追捕教授的途中進入第四十七號住宅：

於是伊凡闖進大門，飛步跑上二樓，立即找到第四十七號，並急促地按了按電鈴。沒等多久便有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給伊凡開了門，她什麼也沒有問，開了門便走了。(頁 58)

故事敘述中的小女孩，並沒有詢問伊凡的身分，就放任伊凡進入住家中，公共住宅中，幾戶家庭共同居住，彼此甚至不熟識。伊凡進入房間後，房間的環境

表現出公共住宅環境昏暗、年久失修：

「這間房間的前廳很大，高高的天花板年久變黑，亮著一盞小電燈，光線昏暗，顯得極其冷清，像是這裡久已無人照管了。牆上掛著一輛沒有輪胎的自行車，牆腳放一個包了鐵皮的大木箱，衣架上方的橫板上擺著一頂冬季棉帽……」(頁 58)

接著伊凡來到浴室，布爾加科夫除了描述浴室的環境外，也寫道：「浴缸裡站著一個一絲不掛的女人，全身都是肥皂沫，手裡拿著浴棉。那女人覷著近視眼朝闖進來的伊凡掃了一眼，顯然由於光線太暗而認錯了人，只聽她十分快活地嬌裡嬌氣地說：『基留什卡！別胡鬧！你發瘋了？……費奧多爾·伊凡內奇馬上會回來的！快走呀！』說著，拿浴棉朝伊凡這邊一揮。」(頁 58-59)

女人說出的話，透露自己與其他男人有染，而這個男人可能是自己在公共住宅中的鄰居，與女人的丈夫彼此認識。

最後伊凡進入了廚房：「這裡一個人也沒有，昏暗中他看到爐台上整齊地放著十來個沒點火的煤油爐。月光透過常年不擦的骯髒玻璃窗，微微照亮一個布滿蜘蛛網的角落，角落裡掛著一個久已被人遺忘、落滿灰塵的聖像神龕，神龕後面露出一對婚禮用的大花蠟燭。神龕下面還掛著一張用別針別住的紙聖像。」(頁 59)

敘述當中，廚房環境也是髒亂不堪，而十幾個煤油爐則代表住戶的數量。被人遺忘且佈滿灰塵的神龕，表示居民為了躲避政府的查緝，只能私底下從事宗教活動。

除了以上對住宅第四十七號的敘述外，在文本中第二十一章，瑪格麗特飛翔於莫斯科上空，也描寫到公共住宅的環境：

轉進一條兩旁都是高層樓旁的狹窄小街。這裡所有樓房的窗子都敞開著。所有窗裡都傳出廣播歌曲。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瑪格麗特往一扇窗子裡看了一眼。原來那是一間廚房。爐台上有兩個煤油爐在吱吱響，旁邊站著兩位婦女，她們各自拿著勺子在互相爭吵。

「我告訴妳，彼拉蓋婭·彼得羅夫娜，廁所的燈用完就得隨手關上！」一個對另一個說，她鍋裡煮的東西熱騰騰冒著蒸氣，「照這樣下去，可別怪我們要打報告請你們搬家！」

「您自己也不怎樣！」另一個回答說。(頁 289)

兩個婦女的對話表現公共住宅的居住環境，因多人居住，難免無法忍受對方的生活習慣而產生爭吵。

莫斯科普遍人民不僅缺乏居住空間，公共住宅的居住環境條件也極度不佳。一般人基本上是幾個人居住一個房間，住房簡陋，家具簡單，甚至沒有暖氣和公共浴室。「廁所總是在不間斷地工作，在每套住宅裡每分鐘都能聽得見廁所沖水的聲音。」¹⁰⁴但於此同時，莫斯科卻出現高級住宅，這些住宅通常只住進一戶家庭，甚至只有一人獨自居住，就能佔有比公共住宅空間大上幾倍的住房。蘇聯時期的領導幹部與特權階級（為官方服務的作家、藝術家及科學家等）擁有絕對良好的住房環境，這些人能夠擁有獨戶住宅，甚至家中的僕人也擁有個人房間。

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提到的住房問題，不只是對當時城市住房現象的描

¹⁰⁴ 參考自 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 (20 – 30-е годы)*,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3, с. 438.

寫，在其中也顯示出特權階級與一般人民的不同。特權階級的部份，文本中以「莫文聯」的成員為代表，從他們的對話中可以發現，作家們討論的重點著重在別墅的數量，而非一般人民煩惱的居住空間：

「領航員喬治」的兩隻小眼睛閃現出快活的火花，她盡量柔和地用女低音說：「同志們，我們用不著嫉妒人家。別墅總共二十二間，正在建築的也不過七間，可是我們莫文聯的會員們有三千人呢！」

「三千一百一十人，」不知誰從角落裡糾正說。

「就是嘛，你們看，」「領航員」繼續說，「有什麼辦法呢？很自然，只能是我們中間那些最有才華的人。」

「都是些大作家嘛！」劇作家格盧哈列夫也直接加入戰局。

別斯庫尼科夫故意打個哈欠，起身走出房間。

「在佩列雷基諾別墅一個人住五間房！」格盧哈列夫衝著他的背影說。

「拉夫羅維奇一個人住六間呢！」杰尼斯金嚷嚷道，「連廚房的牆都鑲了木飾板！」（頁67）

對於特權階級在住房的優勢上的描寫，也表現在瑪格麗特與其丈夫的豪華住所：瑪格麗特的丈夫是科學界的巨擘，作出對全國具有意義的重大貢獻……，夫妻倆住在一所獨門獨院裡，占著那座漂亮的兩層小樓的整個上層，小樓坐落在阿爾巴特大街附近一條巷中的一個小花園裡，可真是個令人神往的所在！（頁265）。而斯喬帕·利霍捷耶夫（Степа Лиходеев）在文本中身為官方瓦列特劇院的經理，擁有與白遼士相同的住房；文學批評家拉銅斯基（Латунский）住家，住在戲劇家與文學家居住的「戲文大樓」（Дом Драмлита）。在當時的莫斯科，若沒有身分地位，就無法取得這些住宅。

《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描寫到住房爭奪的戰爭、普通人民的公共住宅與特權階級的豪華住所等等，布爾加科夫透過這些描述，表現當時住房面貌與生活情況。文本中，撒旦沃藍德在第二十三章的晚會中說出的話，也能反映「住房問題」在城市中對人民帶來的影響：

「這些人呀，人畢竟是人嘛。他們喜歡錢財，這也是歷來如此的……，人類是愛錢財的，不管它是什麼造的，是用皮革、用紙、用青銅，還是用黃金造的，他們都喜歡。嗯，他們太輕浮了……嗯，是啊……慈悲之情有時也會來叩他們的心扉……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凡人……總之，很像從前的人……只是住房問題把他們給毀壞了……」(頁 151-152)

「住房問題」在蘇聯時期是社會上出現的普遍現象，布爾加科夫融合歷史背景與自身經歷，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以獨特的手法描繪出當代社會的「住房」情況，讓讀者了解 1920、30 年代的蘇聯人民在居住上面臨的問題。

當時社會普遍人民居住在公共住宅，其空間狹小、缺乏隱私，此處的「公」與「私」已無明顯區別。而文本中出現的獨戶住宅，也衍生出權力與空間的關係。此外，「格里鮑耶陀夫之家」作為文學團體的根據地，也具有意識型態上的特殊意涵，下節筆者將針對公共住宅引起的「公」與「私」爭議及「莫文聯」引發的權力與空間問題作說明。

第二節 「家」與「城市」：《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公私領域的文化意義

1920-1930 年代的莫斯科正處蘇聯統治初期，新政策與新制度初建立，政府為了方便管理人民，採用集體居住的「公共住宅」。幾戶家庭共同居住的方式，缺點不僅是個人使用空間狹小、居住空間不足、人民隱私蕩然無存，此時期的「公」（public）與「私」（private）界定亦不明顯。於此狀態下，為了獲得更多居住空間與獎勵，社會出現「監視」與「告密」的情況，導致人心惶惶，擔心犯錯或被牽連而遭到政府逮捕。

當時俄國人民普遍無法擁有「隱私」，但於此同時，社會上卻也出現擁有地位與權力者享受著獨戶住宅與特權優惠，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況同時存在於城市中。而文本中莫斯科場景除了社會現象外，還描寫團體的「排他」性，並延伸出權力影響空間的象徵意義。筆者欲藉由「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對空間與權力關係的解釋，針對「私領域」作定義後，探討其衍伸出的社會現象，並對當時權力如何影響空間，使空間具有權力意義做進一步分析。

壹、 監視與告密——《大師與瑪格麗特》莫斯科場景中私領域的「公有化」現象

「公共」與「私人」為社會生活中主要的兩個對比空間，人雖為群居動物，仍具有強烈個體意識，除了公共領域的生活，也需私人空間，亦即一個不受公眾干涉的思想與行為範疇。對「公共」與「私人」兩者的定義說法甚多，本文採用當代社會學中較普遍的概念，以「公」代表政府或公共權力——亦即「官方的」、

公共的，與其對立的「私」則是「民間的」、私人的。亦有社會學者更進一步說明：「公」與「私」的劃界標準可以用「家」來劃分，「家」以內是私人的，而「家」以外則是公共的。¹⁰⁵

在自由主義較盛行的西方，「私領域」及隱私的觀念普遍受到重視，自由主義者認為對某些範圍內的個人思想或行為，尤其是與個人身體與親密活動相關的部份，公眾（國家、社會等）不應干涉，也不得侵犯。¹⁰⁶在現今生活中，無論東、西方，「私領域」也較「公共」更為人重視，確立私領域及個人隱私自主權已成為人們所堅持的信念，證明「私領域」與隱私的重要性。

1920 年代起，蘇聯政府運用集體的公共意識取代「私領域」及私人觀念，導致「私領域」的瓦解。在《大師與瑪格麗特》的莫斯科場景中，就能觀察到「公」、「私」領域界限消失的現象。小說中的莫斯科居民的「家」已非「私領域」之代表，這個現象肇因於其政府大力推行「公共住宅」。

1917 年革命後，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加上國家大力提倡工業化，造成城市居住空間嚴重不足，為解決住房問題，新的居住現象「公共住宅」因此產生。「公共住宅」為幾戶人口集體住在原本一戶人家居住的空間，因此，甚至出現一戶幾口擠在狹小房間的現象，不僅生活不便，個人隱私亦蕩然無存。

「公共住宅」政策施行之後，表面上解決了人民的民生問題，事實上卻隱含當局的政治考量：讓居民彼此監視，以告密獲取更多利益或更大的居住空間。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女傭娜塔莎（Наташа）告訴瑪格麗特（Маргарита）她

¹⁰⁵ 童世駿，〈公與私：劃界問題的歸屬問題〉，《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頁 210。

¹⁰⁶ 黃克武，〈近代中國私領域觀念的崛起與限制〉，《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頁 188。

一直都知道瑪格麗特去哪裡，「女傭們總是什麼都知道的，」黑貓意味深長地舉起一支爪子議論道，「以為傭人都是瞎子，那才是大錯特錯哪。」（頁 360）

除了「監視」外，「告密」也是文本中另外一個現象，瑪格麗特聽到兩位住在公共住宅的婦女吵架，可以用打報告的方式請人搬家：「我告訴你，彼拉蓋婭·彼得羅夫娜，廁所的燈用完就得隨手關上！」一個對另一個說，她鍋裡煮的東西熱騰騰地冒著蒸氣，「照這樣下去，可別怪我們要打報告請你們搬家！」（頁 289）而大師（Мастер）的房子遭侵占，也是身邊的莫加雷奇（Алоизий Могарыч）告密所致。

無所不在的「監視」與「告密」，是蘇聯政府統治的產物。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認為，一個政府如果同時具有應得權力（*Condign power*）、補償權力（*Compensatory power*）和調控權力（*Conditioned power*），即為極權政府。所謂「應得權力」是通過實際的或預定的懲罰贏得服從；「補償權力」則通過實際的或預定的恩惠而贏得服從，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給予否定性的報償，而後者則給予肯定性的報償。「調控權力」承認權威和服從他人意志，其中分為兩項：公開調控（*explicit conditioning*）通過說服或教育培養；隱蔽調控（*implicit conditioning*）則受文化支配，亦即服從既正常且合乎主流。¹⁰⁷在史達林時代，蘇聯政府補償獎勵、應得懲罰和公開調控三管齊下，充分施展，¹⁰⁸才能運用「監視」與「告密」達到監視人民的目的。

極權政府雖擁有所有權力，卻也難完全掌控社會，為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及提升臣服的意願，政府最明顯的就是在經濟方面的努力和投資，即為「誘因」（*incentive*），所謂「誘因」是比給予人民服從的補償性獎勵更為有效、且更有

¹⁰⁷ 詳參：加爾布雷斯著，劉北成譯，《權力的剖析》。台北：時報文化，1992，頁 17。

¹⁰⁸ 同上註，頁 34。

強制性的東西。社會上的「誘因」都具有補償性的獎勵方式。¹⁰⁹政府施放「誘因」並運用上述的三種權力迫使人民服從，進而獲得獎勵，劉軍寧將對權力的服從分為三種不同情形，一為由於害怕心理和畏懼懲罰而服從，二是為了得到某種好處而服從，三則是由於欽佩心理而導致的服從¹¹⁰，文本中出現的「告密」現象，屬於一與二，既害怕懲罰，又希望得到某種好處，這也是人民在蘇聯時期為求自保的方式。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政府的「誘因」即為「告密」，人民採取「告密」的方式就能獲得政府的獎勵。

蘇聯政府除了利用人民自發的「監視」與「告密」控制社會外，也用不明原因逮捕他人。《大師與瑪格麗特》文本中描寫怕說錯話、做錯事而遭到逮捕，或是人莫名消失的情節，例如瓦列特劇院的總務協理瓦列奴哈（Варенуха）不知去向，令財務協理林姆斯基（Римский）產生懷疑：當然，林姆斯基知道瓦列奴哈的去處，但他不明白怎麼竟會一去不復返。林姆斯基聳聳肩膀，自言自語地說：「他會是犯了什麼案嗎？」（頁143）此外，瓦列特劇院經理斯喬帕·利霍捷耶夫（Степан Лиходеев）也因莫文聯主席白遼士（Берлиоз）的住宅被查封，擔心與他生前的對話會使自己遭受牽連：

他想起文章，緊接著便想起了那一場很有問題的談話。記得是四月二十四日晚上，他和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白遼士就在這間餐室裡一起吃晚飯時談了一次話。按理說，當然也不能說那是一次成問題的談話（何況他斯喬帕也絕不會和別人進行什麼有問題的談話），不過，那次談的話題確實是多餘的。各位公民，我們完全可以憑自由意志而不去說那些話嘛！在白遼士的房間被封之前，毫無疑問，那次談話可以說是區區小事，根本算不了什麼，可

¹⁰⁹ 詳參：加爾布雷斯著，劉北成譯，《權力的剖析》。台北：時報文化，1992，頁22。

¹¹⁰ 參考：劉軍寧，《權力現象》。台北：台灣商務，1992，頁82-83。

是，如今這房間一被查封……（頁 96）

從此段描述可以了解，劇院經理斯喬帕其實不知道自己曾經說過什麼，但因為白遼士的房間被查封，他也擔心自己是否會因為之前的對話受牽連，深怕說錯話遭到逮捕。

除了這個現象之外，白遼士與斯喬帕所居住的公寓，之前的房客也莫名消失，毫無原因。恰恰是從兩年前開始，這棟房子裡接二連三出現教人無法解釋的事——住戶開始一一地失蹤。（頁 89）故事敘述到，有民警將住戶帶走，就再也沒有回來了，這個情況不只發生一次，而是接二連三，有人解讀為鬧鬼或中邪，但透露的是，政府有無限的權力可以將人民逮捕，人的無故消失絲毫不足為奇。

來歷不明的外國人、擁有外幣是另一項容易被指控的罪名。在《大師與瑪格麗特》開頭，當沃蘭德（Воланд）插入白遼士與無家漢（Бездомный）的對話，外國人模樣加上一口流利俄語，不禁讓兩位文人起疑竇，甚至升起將他扣住帶至相關單位的念頭：

詩人對著白遼士的耳朵說：「這傢伙裝瘋賣傻，就是想從話裡套出點什麼…你聽他俄語講得多好！」詩人邊說邊用眼角瞄著來歷不明的人，惟恐他溜掉，「走，咱們去扣住他，不要讓他跑了……」（頁 16）

在小說第九章中，住房管理所主任尼卡諾爾·伊萬諾維奇（Никанор Иванович）為處理第五十號公寓之事來到白遼士住處，卻發現來歷不明的外國人及其翻譯卡羅維夫住在其中，為了爭取暫居於此的權力，卡羅維夫開出每天租金五百盧布的價碼，並於主任臨走前，「把很厚一疊窸窣作響的紙幣」塞到他的

手裡，尼卡諾爾紅著臉拒絕，但卡爾維夫執意要他收下，並且表示這是外國禮儀。

「這種事一旦被發現，要嚴懲的！」主任壓低聲音說，同時間往周圍看了看。

「誰看見啦？」卡爾維夫又對著他的另一隻耳朵說，「請問，證人在哪兒？我說：您這是怎麼啦？」（頁119）

回到家後，尼卡諾爾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兩位公民」來到家中，頭一個人邊走邊把證件掏出來，交給尼卡諾爾·伊萬諾維奇看了看，第二個人已經搶先站到廁所裡的小凳子上，把一隻手伸進了通風孔道。來人打開報紙包，但裡面包的不是盧布，而是一種他不認得的鈔票，顏色介乎藍綠之間，上面還有個老頭像。（頁121）

在蘇聯政府的統治下，「私領域」因為「監視」、「告密」與「逮捕」的現象而消失，人民隱私的權利遭剝奪，「官方」與「集體」生活，成為新的生活秩序。在《大師與瑪格麗特》的莫斯科場景中，我們看到了「私領域」的公有化現象，其所衍伸出城市空間與權力的關係，將在下一部份說明。

貳、文本中莫斯科場景的空間與權力關係

「城市」空間，長久以來便是許多小說的場景，對城市地景的描繪，也表達了社會與生活的信仰，麥克·寇恩（Mike Crang）舉例：在《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中，雨果（Victor Hugo）將小說設定在巴黎，描寫城市中的窮人巷弄，城市黑暗猶如迷宮，同時也描寫出底層社會與官員及國家世界的對比。布爾加科夫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則以莫斯科城為故事背景，其房舍建築與人物，

皆為布氏表達當代社會所做之安排。

在文本中能看見一個城市同時存在權力擁有者居住的豪華環境及公共住宅破舊髒亂的描述。譬如瑪格麗特的家：「夫妻倆人住在一所獨門獨院裡，占著那座漂亮的兩層小樓的整個上層，小樓坐落在阿爾巴特大街附近一條巷中的一個小花園裡，可真是個令人神往的所在！」（頁 265），就與「無家漢」伊凡追捕教授時，經過公共住宅的環境相對比，文本中描述道：「藉著熱水器下燃著的炭火光，他看到室內牆上掛著兩個大洗衣盆，地上有一個大浴缸，浴缸的搪瓷剝落，露出一塊塊可怕的斑點。」（頁 58）另外，瑪格麗特飛翔在莫斯科空中的章節，也描寫出同一條街上呈現了公共住宅與文學家與戲劇家居住的「戲文大樓」（Дом Драмлита）兩種不同的建築面貌，同樣身處莫斯科，兩者的居住環境卻差距甚大。這些文本中的描述除了反映當代社會，也表達了城市中空間與權力的關係。

空間與權力兩者的關係，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主要探討的主題之一，學者研究文化地點及空間的差異，同時關注群體差異、物質文化，以及兩者如何結合。「不僅談到文化如何散佈於空間，也探討文化如何讓空間有意義。」¹¹¹文化地理學涉及世界、空間和地方如何為人所詮釋與利用，除此之外，文化地理學者也認為文化經常是政治性的，且充滿抗爭，因此，探討權力和意義在政治上如何寫入地景，也是其相關研究重點。

如上節所示，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之中，反映 1920、30 年代政府運用「監視」控制社會，政府權力影響社會空間，而「空間的形式透過人類的行動產生，在固定的生產模式及發展模式下，表現出統治階級的利益，也表現出政府的權力

¹¹¹ 麥克·寇恩（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3。

關係。」¹¹²蘇聯的「監視」空間，就是表示政府的權力，也說明了在政治上權力如何影響空間。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利用邊沁（Jeremy Bentham）的環狀監獄作為權力運作的範例，說明囚犯在牢房中一舉一動被監視，形成規訓權力（discipline）¹¹³。規訓權力中，空間扮演重要角色，透過空間的規劃，人的行為舉止受到規範。另外，畢恆達在《空間就是權力》也以洛杉磯與紐約為例，利用城市的空間設計，確保富人、窮人，黑人與白人的隔離。這些皆是城市在空間規劃加入政府權力的例子，蘇聯政府也運用此方式建立《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描述的城市監視空間，人們害怕遭到迫害或逮捕，進而自我規訓或監視他人，利用眼線的串聯方式將城市包圍，也使政府權力在城市中運作自如。

「監視」空間形成，人的一舉一動遭控制，對一般俄國人民而言，「私領域」已不復存在，然而於此同時，有社會地位或擁有權力之位者，卻能擁有空間及權力，而這些空間成為在地理上具有表達思想與權力的地景。

麥克·寇恩（Mike Crang）認為，「地景可以解讀為文本（text），闡述人群的信念。地景的塑造被視為表達社會的意識型態，然後意識型態又因地景的支持而不朽。」¹¹⁴《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格里鮑耶陀夫之家」（Дом Грибоедова）作為「莫文聯」的根據地，本身即為表達團體政治思想的地景。這個地景具有身份的選擇性及特殊排他性。在「莫文聯」團體的形成中，有「界定」成員身分的特徵。這些界定的特徵隨著時空而變，而這些特徵都帶有深遠的政治後果。¹¹⁵團體形成後，需要有空間做為依據，開始「他者化」的過程，而「他者化」在界定

¹¹² 參考：Castells M.,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275 轉引自：廖淑婷，《權力與空間形塑之研究：以台北市都市公園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21。

¹¹³ 傅柯寫道：「那些使肉體力量永久服從的，並施加於肉體上一種溫馴且有用的方法就叫做規訓。」引自：楊大春，《傅柯》。台北：生智，1995，頁 147。

¹¹⁴ 麥克·寇恩（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35。

¹¹⁵ 同上註，頁 80。

「他者」時，空間又至關重要。群體以某個特色來界定自我，然後將非成員界定為殘餘部份¹¹⁶，將認同投射在地景上，揭露了不平等關係。「莫文聯」以「格里鮑耶陀夫之家」做為根據地，將原本是公開文學討論與創作的地方私有化，並界定「他者」，運用權力將「他者」，即與團體意識型態相違背之人排除在外，使「格里鮑耶陀夫之家」成為「莫文聯」權力象徵的地景。例如文本中對於「格里鮑耶陀夫之家」的介紹，不只提到這棟樓中的莫文聯會員生活優越，也提到並非人人皆能擁有會員身份：

任何一個來訪者（當然，只要他不是徹頭徹尾的傻子）踏進格里鮑耶陀夫之家後的頭一個想法必然是：這些幸運兒，莫文聯的會員們，生活得多好啊！然後他會立即受到卑劣的嫉妒心的折磨，會馬上痛苦地向蒼天發出責難，埋怨上蒼沒有在他降生時賜予他文學稟賦；而既然沒有文學天賦，當然休想取得莫文聯的會員證——那散發出貴重皮革的氣味、壓著寬寬的金邊兒、整個莫斯科無人不知的褐色會員證。（頁 64）

而團體排除「他者」的方面，文學批評家拉銅斯基（Латунский）和阿里曼（Ариман），及文學家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羅維奇（Мстислав Лаврович）將大師的作品比喻為「編輯卵翼下的敵人、比拉多私貨及猖狂的舊教徒」（頁 175），並認為作品違背無神論的立場，僅靠三人的說法輕易地否決文章內容並且禁止作品出版，這也是文本中文學團體運用權力排除異己的情節描述。

除了「格里鮑耶陀夫之家」為表現權力的地景外，文本中還有白遼士擁有的花園街住宅、住著文學與戲劇界重要人士的「戲文大樓」瑪格麗特的家。這些建

¹¹⁶ 麥克·寇恩（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62。

築也都是權力的體現，說明在當代社會，如果沒有社會地位與身份，便無法擁有這些住宅，連布爾加科夫對當時這種建築都說：「這是莫斯科建築叢林中一個精美的糖果盒」¹¹⁷。在文本中的莫斯科，權力與空間呈現支配上的關係，權力能對空間造成不良影響，例如住著違反意識型態與無神論之人的精神病院及人民缺乏隱私的公共住宅，兩者是權力壓迫與剝奪空間最好的例子。

地景寫入文學中，不僅反映當代社會，也表達作者思想，布爾加科夫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描寫蘇聯政府運用「監視」功能管控人民。「監視」使人民失去「私領域」的擁有權，但具有社會地位與權力的擁有者卻能夠擁有私人空間。然而權力運用不當，就會造成空間功能的扭曲。文本中，蘇聯統治下的莫斯科，權力除了使富者更富，卻也造成底層社會的貧窮、社會的恐懼與緊張。

¹¹⁷ 錢誠，《米·布爾加科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62。

第三節 小結

筆者在第一節首先敘述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掌權，隨後內戰結束，人民大量湧入城市，「公共住宅」為因應過多的城市居民而出現。布爾加科夫也曾經住過「公共住宅」，並且將自身經歷寫入作品中。在莫斯科，一般居民的公共住宅與特權階級的獨戶住宅同時存在，彷彿可在城市中看見兩種不同的世界。

文學社會學家盧卡奇認為，文學是作者反映社會現實的方式，且作品中的人物並非皆是捏造，反而表現了作者本身的「世界觀」。《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情節與人物皆是布爾加科夫的安排，並且反映作者的親身經驗及當代社會現實。

關於住房問題的描寫，文本中包括「格里鮑耶陀夫之家」中關於住房問題的門總是大排長龍、人民不惜捏造各種理由取得白遼士死後留下的住房、白遼士的姑父為了接受姪子的住宅遠從基輔趕至莫斯科等等的情節。另外，城市居住空間不足也造成「告密」的現象，為了得到住房，文本中描述莫加雷奇背叛了大師。接著，筆者舉出無家漢進入第四十七號住宅及瑪格麗特飛翔於莫斯科上空的情節，說明兩者皆有描寫公共住宅面貌。而描寫特權階級者居住的獨戶住宅部份，筆者則以瑪格麗特的家、「戲文大樓」等為例。

在第二節，筆者分析《大師與瑪格麗特》中蘇聯政府將「私領域」公有化的現象。「公共」與「私人」是人類生活的主要空間，人雖有群體活動，但更需要私人空間。筆者對於「公」與「私」的界定採用社會學普遍的概念，「公」代表官方，而「私」則為個人，其基本界定在於「家」，在蘇聯社會與《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呈現的「家」，不再具有傳統的定義。大量農民湧入城市後，集體居住的公共住宅模式出現，人民運用「監視」的方式以求得居住空間。

「私領域」的消失，在蘇聯極權社會中顯而易見，極權政府利用三種權力方式控制社會，並且施放權力的「誘因」，人民因為害怕懲罰，並為了獲得好處，運用「告密」的方式得到報酬。除此之外，在蘇聯極權社會也常見政府毫無原因地逮捕人民。《大師與瑪格麗特》中蘇聯政府在城市進行的恐怖統治，進一步衍伸出空間與權力的關係。

城市空間為許多文學作品描寫的對象，城市地景的描繪反映當代社會，也能表現政治權力如何影響城市空間安排。空間與權力的關係，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對象，空間與權力牽涉到政治因素，並且影響地景。「格里鮑耶陀夫之家」表達「莫文聯」的意識型態，並且具有身分的挑選性與排他性，隔絕異己之人。文本除了出現權力象徵的地景，包括「格里鮑耶多夫之家」、莫文聯主席白遼士的住宅等等之外，也存在遭權力壓迫的空間，這個部份則有精神病院及公共住宅，表示權力對空間具有絕對的支配關係。

權力影響城市空間，運用「監視」與「告密」控制人民。上層階級擁有社會地位與權力，而普通人民權利卻受侵害。蘇聯政府對莫斯科的恐怖統治，透過空間與權力的關係顯現在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中。

結論

本論文以《大師與瑪格麗特》為根據，以文本中描述的「莫文聯」探討蘇聯時期 1920、30 年代文學團體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及「文學團體」與作者布爾加科夫的關係。文學的創作不僅單靠作者捏造及幻想，也真實反映作者思想、經歷及當代社會的「日常生活」。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運用奇幻與諷刺等手法創作，描寫「日常生活」的內容。文本中的「莫文聯」，在當代社會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思想及行為。此外，藉由「莫文聯」衍生出的「住房問題」及權力與空間的關係，也能了解當代社會現象。筆者透過「日常生活」的角度分析「莫文聯」，可以歸納出本論文研究的結論：

一、《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莫斯科場景描寫，不僅反映當代社會，也反映作者本身的世界觀。

「小說的真相超越了單純事實。小說的真實相較於實質的日常真實，可能超越之，或者包含更多真相。」¹¹⁸布爾加科夫作為軍醫，親眼目睹戰爭對人民的磨難，使他投身於創作。布氏的作品大多包含對當代社會現實與作家經歷的描寫，例如官場的腐敗、統治制度改變下的城市與生活等。

布爾什維克掌權後，俄國在日常生活上出現許多改變，在居住方面，為因應內戰後眾多湧入城市的人民，出現「公共住宅」的居住方式。文學方面，1920 年代初期，眾多文學團體自由發展。史達林掌權後，文學團體收為官辦，作家受到極大的限制。布爾加科夫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描寫 1920、30 年代人民生

¹¹⁸ 參考：Pocock D.,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London: Croom Helm, 1981, p. 11. 轉引自：麥克·寇恩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60。

活的公共住宅及文學團體如何打壓作家等當代社會現象，這些情節反映了真實，也反映了當代社會。此外，文本提到公共住宅中出現神龕與紙聖像，也突顯政府只能在表面上控制社會上的思想與行為，人民其實仍私下舉行宗教活動。

二、文學團體改為官辦的政治背景，賦予「莫文聯」權力，並迫害違反意識型態者。

自文學團體在俄國發展以來，逐漸帶有政治色彩，團體除了進行文學討論與發表之外，部分成員也欲藉由團體來表現自己在政治上的理想與抱負。1920年代初期，文學團體百家爭鳴，此時期的文學團體自由發表想法與理念，並且開辦雜誌，許多有名的文學作家皆參與過這些文學團體的運作。史達林上任後，控制文學團體的發展，文學團體改為官辦，並由政府操控，打壓反對共產政權的作家。

文學團體具有的官方政治色彩，成為布爾加科夫在創作《大師與瑪格麗特》的歷史依據，文本中的「莫文聯」影射當時官辦的文學團體，「莫文聯」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權力與特權地位，團體中的成員皆奉行政府灌輸的思想，產生一致化且標準化的行為與思維模式。

「莫文聯」控制莫斯科的文學發展，團體奉行政府提倡的「無神論」，大師的作品具有宗教意識，受到「莫文聯」的作家與批評家否定並遭政府當局逮捕，最後住進精神病院。「莫文聯」在社會上具有廣大權力，與大師產生「團體」與「個人」權力關係上的衝突。衝突中，沒有兩者相當的平等地位，在當時的蘇聯社會，權力的主客體也無法轉換，造成大師成為「莫文聯」權力底下的犧牲者。

史達林統治下的文學團體轉為官辦，代替政府行使在文學界的統治權力，布爾加科夫將此歷史現實寫進《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成為「莫文聯」權力運作的

歷史背景，大師進入精神病院的結果，正是在當代社會可能發生的悲劇。

三、《大師與瑪格麗特》中「莫文聯」衍生的住房問題，帶有權力與空間上的聯結關係。

布爾加科夫在眾多作品中皆提到「住房問題」，這是 1920、30 年代莫斯科人民真實面對的生活情況，也是蘇聯政府對於人民集體管理所施行的政策。《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眾人搶奪「莫文聯」主席住房的情節，表現出當時在城市中取得住房實屬困難；而文本中又因為住房的問題，衍生出特權階級及普通百姓的居住差異。兩者在住房上所產生的不同，歸因於特權階級擁有權力。以「莫文聯」為代表的特權階級，住房的奢華程度正好與普通百姓的「公共住宅」成為強烈對比。

「公共住宅」缺乏隱私，「公」與「私」的界定並不明顯。蘇聯「集體化」下，「私領域」幾乎消失，人民在政府監視的環境下生活，產生「告密」的現象，人民以告密的方式換取政府的獎賞。在《大師與瑪格麗特》中也出現「監視」與「告密」現象的情節描述，人民擔心自己隨時會因不明原因而遭政府當局逮捕。

蘇聯時期，雖然普通人民缺乏「私領域」，必須集體生活。但特權階級因為擁有權力能獲得良好的居住環境，這是權力影響空間所致。權力不僅深入居住的環境，也影響所有生活上的空間。《大師與瑪格麗特》中「格里鮑耶陀夫之家」為「莫文聯」的權力地景，它代表「莫文聯」的意識型態，並且挑選成員身分、排除異己，一般人不得其門而入。

在文本的莫斯科場景的中，建築皆受權力支配，不僅出現「格里鮑陀多夫之家」、「瓦列特劇院」、「戲文大樓」等權力擁有者的代表建築，也出現位於社會底

層，缺乏權力的「公共住宅」及「精神病院」。

《大師與瑪格麗特》反映蘇聯社會 1920、30 年代的歷史現實，也包含布爾加科夫本身的創作經歷。文本當中的日常生活描寫，是觀察當代社會最好的樣本，而作品中出現的「莫文聯」，不僅表現出文學團體收為官辦後，運用權力欺壓反對者的現象，它引發的住房問題也進一步帶出權力與空間的關係。



參考書目

原典

Булгаков, М. 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роман. — М.: АСТ: АСТ МОСКВА, 2009.

布爾加科夫著，錢誠譯，《大師與瑪格麗特》。台北：究竟，2009。

布爾加科夫著，曹國維譯，《不祥的蛋（收錄《狗心》）》。上海：上海譯文，2005。

布爾加科夫著，徐昌漢譯，《莫斯科——時空變化的萬花筒》。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專書及論文

一、中文部份

麥克·寇恩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

王逢振，《文化研究》。台北：揚智文化事業，2000。

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譯，《巴赫金全集——文本、對話與人文》（第四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戈德曼著，段毅、牛宏寶譯，《文學社會學方法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加爾布雷斯著，劉北成譯，《權力的剖析》。台北：時報文化，1992。

伊凡絲著，廖仁義譯，《郭德曼的文學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1990。

沈志華主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李毓榛，《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波寇克著，田心喻譯，《文化霸權》。台北：遠流出版，1991。

周雪舫，《俄羅斯史》。台北：三民書局，2005。

- 科塞著，孫立平等譯，《社會衝突的功能》。台北：桂冠，1991。
- 孫亦平，〈《大師和瑪格麗特》中怪誕諷刺的審美功能〉，《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第5期，2007，頁89-92。
- 殷明明，〈試論《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耶舒阿〉，《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7期，2008，頁118-119。
-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1。
- 曹廷清、楊成竹，《蘇聯簡史》。台北：五南，1993。
- 陳茵茵，〈《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時代與文本〉，《第一屆斯拉夫語言、文學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2009，頁64。
- 陳茵茵，〈布爾加科夫長篇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中邪惡勢力之結構形成與作用分析〉，碩士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03。
- 張建華，〈20世紀20年代蘇聯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地位〉，《社會科學》，第10期，2010，頁115-125。
- 張春興，《現代心理學》。台北：東華書局，2008。
- 黃俊傑、江宜樺編，《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
- 黃曬莉，《中國人的人際和諧與衝突：理論建構及實徵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葉水夫，《蘇聯文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溫玉霞，《布爾加科夫創作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 塔迪著，史忠義譯，《20世紀的文學批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 楊大春，《傅柯》。台北：生智，1995。
- 楊蘇紅，〈小丑的笑聲—評《大師與瑪格麗特》中的小丑形象〉，《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5，頁47-49。
- 廖淑婷，《權力與空間形塑之研究：以台北市都市公園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

- 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趙曉彬，〈「家」與「偽家」：《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兩種對立的精神世界〉，
《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2007，頁60-67。
- 鄢定嘉，〈接近真理的荒誕——試析哈爾姆斯中篇小說《老太婆》的荒誕詩學〉
《俄語學報》。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第10期，2006。
- 劉軍寧，《權力現象》。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 盧卡奇著，楊恆達譯，《小說理論》。台北：唐山，1997。
- 賴特·凱勒著，林義男譯，《社會學》(上)。台北：巨流，1997。
- 歐茵西，《俄羅斯文學風貌》。台北：書林，2007。
- 賴盈銓，〈俄國二十世紀 20-30 年代文本的宗教意識研究〉，《俄語學報》，第九
期，2007，頁97-122。
- 錢誠，《米·布爾加科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 謝周，《滑稽面具下的文學騎士——布爾加科夫小說創作研究》。重慶：重慶出版
社，2009。
- 謝幼偉等著，《蘇俄研究論集》(二)。台北：中華文化會，1955。
- 蘇月琴，《高中職學校行政人員溝通行為、角色衝突與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屏東：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二、俄文部份

- Абрашкин, А. А. Макарова, Г. Б. *Тайнопись «Мастера и Маргариты»*. — М.:
Вече, 2006.
- Агеносов В. (ред.)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 В 2 ч. Ч.
1. — М.: Дрофа, 1996.
- 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 (20 – 30-е
годы)*. —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3.

- Антипина, В. А.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1930-1950-е годы*. —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5.
- Баевский В.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 Компендиум. —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 Беловинский, В.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ой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 М.: Высш. шк., 2008.
- Бояджиева Л. *Москва Булгаковская*. М.: Астрель: Олимп, 2009.
- Выходцева, П.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 2-е.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 М., «Высш. школа», 1974.
- Гаспаров М. Л.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лейтмотивы*. — М., 1994.
- Добренко, Е. Стал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спустя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9. № 6. С. 224-245.
- Дубровина И. *Автор и е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 М.: МАКС Пресс, 2009.
- Жураев С. *Иностранцы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1920-1930-е гг. Источники и методы социа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ис. на соиск. Учен. Степ. Докт. Ист. Наук. М., 2000.
- Корман Б.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Ижевск: Типография Удмур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8.
- Кормилов, С. И.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20-90-е годы)*. — М.: МГУ, 1998.
- Кременцов Л.П.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пед.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в 2 т.* — Т. 1: 1920-1930-е годы. —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 2002.
- Кузнецов, Э. Кто такой Александр Рюхин?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8. № 3. С. 321-335.
- Кузина, Н. В. Человек перед лицом истины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 № 4. С.

214-220.

- Кураев, А. Д.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за Христа или против?* —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Совет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2006. (Изд. 2-е, испр. и доп.)
- Лесскис, Г. Атарова, К.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по роману Михаила Булгаков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 М.: ОА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адуга», 2007.
- Лотман Ю. *Воспитание души*. —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 СПб», 2003.
- Лотман Ю. Символика Петербурга и проблемы семиотики города // Лотман Ю. *Избр. статьи: В 3 т. — Т. 2.* — Таллинн, 1992.
- Меньшикова, Е. Музыкальная скрижаль искусства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9. № 4. С. 167-190.
- Николюкин А. Н. (ред.)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М.: НПК «Интелвак», 2001.
- Петелин В. *Жизнь Булгакова. Дописать раньше, чем умереть*. — М.: ЗА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5. Семенниковой Л.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М.: МГУ, 2009.
- Соколов А. *Покол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СПб.: Изд-во СПбГУП, 2009.
- Солоков, Б. *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загадки судьбы*. — М.: Вагриус, 2008.
- Соколов Б. *Расшифрованы Булгаков Тайны «Мастера и Маргариты»*. —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6.
- Федоров, Ф. П. Несколько мыслей по поводу комментария к Мастеру и Маргарите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3. № 1. С. 260-265.
- Чудакова, М.О.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шлого*. —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1.
- Шабалина, Л. Н. *Жили в Москве былой*.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К», 2007.
- Шошин, В. А. 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в контексте XX века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4. № 4. С. 228-236.

Яблоков, Е. 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Михаила Булгакова*. —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1.

Яновская, Л. Понтий Пилат и Иешуа Га-Ноцри. В зеркалах булгаковедения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10. № 3. С. 5-72.

三、英文部份

Blake, R. R. & Mouton, J. S., *The Managerial Grid.*, Houston: Gulf Pub, 1964.

Busch, R. L., “The Contexts of Bulgakov's *Master i Margarita*” in *Aspects of Modern Russian and Czech Literature*. Columbus; Ohio: Slavica Publishers, 1989.

Castells M.,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Clark, K., *The Soviet nove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Edwards, T. R. N., *Three Russian writers and the irrational*.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Garrard, John. Garrard, Carol, *Inside the Soviet Writer's Un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0.

Hingley, Ronald, *Russian writers and Soviet society 1917-1978*.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79.

Lotman, Iurii M., “The Poetics of Everyday Behavior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Culture” in *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Lotman, Iurii M., “The Decembrist in Daily Life (Everyday Behavior as a Historical-Psychological Category)” in *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Moser, Charles 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ondy, L. R., *Organization conflict: Concepts and Mode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12, 1967.

Shentalinsky V., *Arrested voice: resurrecting the dissappeared writers of the Soviet regim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Templer, William,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Prinston; New Jersey: Prins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Vernadsky G.,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Zholkovsky, Alexander, "The Master and Margarita-polyphony and the Soviet theme" in *Text counter text : rereadings in Russian literary histo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Ziegler C., *The History of Russia*. Santa Barbara, Calif.: Greenwood Press, 2009.

四、網路資源

Белова Л. Н., Бульгаков Г. Н., Дегтярев А.Я. и др.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етроград. Ленинград: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ед., 1992.

http://dic.academic.ru/dic.nsf/enc_sp/2307/%D0%A1%D0%B0%D0%BB%D0%BE%D0%BD%D1%8B (資料擷取日時間：2011.06.25)。

Брокгауз Ф. и Ефрон И., Салоны.

http://dic.academic.ru/dic.nsf/brokgauz_efron/90391/%D0%A1%D0%B0%D0%BB (資料擷取時間：2011.02.05)

Мега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ирилла и Мефодия. Беседа любителей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

<http://www.megabook.ru/Article.asp?AID=615591&SA=SA> (資料擷取時間：

2011.02.03)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ужки.

<http://www.rusinst.ru/articletext.asp?rzd=1&id=4620> (資料擷取時間：2011.02.08)

Орлов Б.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http://www.hse.ru/data/261/449/1233/1%D0%9E%D1%80%D0%BB%D0%BE%D0%B2%D0%98%D0%91%D0%A1%D0%BE%D0%B2%D0%B5%D1%82%D1%81%D0%BA%D0%B0%D1%8F%20%D0%BF%D0%BE%D0%B2%D1%81%D0%B5%D0%B4%D0%BD%D0%B5%D0%B2%D0%BD%D0%BE%D1%81%D1%82%D1%8C.doc> (資料擷取時間：2010.05.06)

Орлов Б. Микроистория: «атомизац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или её иной образ?

<http://www.hse.ru/data/2010/03/13/1231126164/%D0%9C%D0%B8%D0%BA%D1%80%D0%BE%D0%B8%D1%81%D1%82%D0%BE%D1%80%D0%B8%D1%8F.pdf> (資料擷取時間：2010.06.18)

Сайт об А. С. Пушкине. Кружок «Арзамас».

<http://www.cio.arcticsu.ru/projects/pr1302/arzamas.htm> (資料擷取時間：2011.02.05)

Селивановский А. Попутчики.

<http://slovari.yandex.ru/~%D0%BA%D0%BD%D0%B8%D0%B3%D0%B8/%D0%9B%D0%B8%D1%82.%20%D1%8D%D0%BD%D1%86%D0%B8%D0%BA%D0%BB%D0%BE%D0%BF%D0%B5%D0%B4%D0%B8%D1%8F/%D0%9F%D0%BE%D0%BF%D1%83%D1%82%D1%87%D0%B8%D0%BA%D0%B8/> (資料擷取時間：2011.07.18)

Черутти С. Микроистория: соци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культурных моделей?

<http://orbis-medievalisru.47.com1.ru/library/cerutti.pdf> (資料擷取時間：2010.06.19)

Эйдельман Т.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кружки и салоны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http://www.krugosvet.ru/enc/kultura_i_obrazovanie/literatura/LITERATURNIE_KRUZHKI_I_SALONI_DOREVOLYUTSIONNO_ROSSII.html（資料擷取時間：

2011.06.25）

Кружки и салоны XVIII века.

<http://www.litra.ru/composition/get/coid/00735971223554786306/>（資料擷取時間：2011.02.05）

陳美芬，重繪《大師與瑪格麗特》的理性觀照與神性啟示。

<http://www3.nccu.edu.tw/~mfchen/research/ms1.htm>（資料擷取時間：2010.12.03）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ЧЖЕНЧЖИ
ФАКУЛЬТЕТ СЛО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И ЛИТЕРАТУР

Лю И-чжень

Анализ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романа М. Булгаков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магистр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науч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
кандидат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Янь Дин-цзя

Тайвань, Тайбэй - 2011

Общ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работы

Рус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автор романа-антиутопии «Мы» Е. Замятин в статье «О сегодняшнем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пишет: «У автора, несомненно, есть верный инстинкт в выборе композиционной установки: фантастика, корнями вращающаяся в быт»¹¹⁹. Тако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вполне подходит к пониманию сут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ихаила Афанасьевича Булгакова (1891-1940), автора ряд повестей, пьес, и,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бессмертного роман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Ещё до начала работы над романом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уже видно основное мастерство М. Булгакова – с помощью гротеска писатель обозначает двойной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ый план – сочетание в одно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пласте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городской жизни, и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го начала. Такой сатирический дар уже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в повестях писателя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1920-х годов: «Дьяволиада», «Роковые яйца» и «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

Свою итоговую книгу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М. Булгаков начал писать с 1928 г. и писал до самых последних дней. «Архитектура» этого романа уникателен и масштабна. Многоплановая компози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и двойная временно-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пределяет сложность эт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привлекает внима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разных поколений. Центром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учных работ являются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любов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ая связь между романом М. Булгакова 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и друг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в частности, русские классики А. Пушкин, Н. Гоголь, М.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А. Чехов, и ещё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драматург Жан Мольер и немецкий романтик Э. Гофман.

¹¹⁹ Цит. по: Кременцов Л.П.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пед.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в 2 т.* – Т. 1: 1920-1930-е годы. –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 2002. – С. 127.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пишет М. Гаспаров, один из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роман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указывая на то, что многоликость роман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копаться до конца: «Мы не ставим своей задачей ни исчерпывающий анализ мотивных связей в структуре романа, ни сложение этих связей в единую абсолютно-целостную и целостно-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концепцию. Решение такой задач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невозможной не только в рамках од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о и в принципе»¹²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ышесказа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на наш взгляд, не могут охватывать глубок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самого романа. Роман интересен такж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м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браз жизни член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которая получает в романе название «МАССОЛИТ».

М. Булгаков называл себя «мистическим писателем» и писал: «С первой чертой в связи все остальные, выступающие в моих сатирических повестях: черные и мистические краски, в которых изображены бесчисленные уродства нашего быта, яд, которым пропитан мой язык, глубокий скептицизм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роисходящего в моей отсталой стране, и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ему излюбленной и Вели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а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 изображение страшных черт моего народа»¹²¹. В «Мастере и Маргарите» чувствуется склонность писателя к «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мистицизму»¹²². Однако мы же не можем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что М. Булгаков обладает «резким, определенно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м мышлением»¹²³. Какой талант его наиболее ясно показан в романе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особенно в описании писателем московской линии. И мы не можем не согласиться с К. Паустовским, что «слушая Булгакова,

¹²⁰ Гаспаров М. Л.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лейтмотивы*. – М., 1994. – С. 32.

¹²¹ Цит. по: Агеносов В. (ред.)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 В 2 ч. Ч. 1. – М.: Дрофа, 1996. – С. 418.

¹²² Петелин В. *Жизнь Булгакова. Дописать раньше, чем умереть*. – 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5. – С. 579.

¹²³ Там же.

становилось ясным, что его блестящая выдумка, его свободн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 это одно из проявлений все той же жизненной силы, все той же реальности»¹²⁴.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данн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ой работ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проблем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образ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и также «квартир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которая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московских жителей. Этим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данн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Что такое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По определению Л. Беловинского,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практическую реализацию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бытие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выработку нов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норм и стандарто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е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формируемых жизненным опытом индивида и социума»¹²⁵. Причем она сочетает различные виды 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й и обыд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детерминированы «ценностными ориентациями человека, переживающего здесь и сейчас как настоящее, так и неотъемлемое от него прошлое, переживаемое как субъективно, в живом восприятии людей, так и объективно, как данность, налагающая отпечаток на настоящее»¹²⁶.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вырисовывается в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жизни социума», она объединяет разные аспекты образ жизни, такие, как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нравы, обычая, стереотипы восприятия и поведения, вкусы, оценки и т.п., как «способ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о мире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в формах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форме»¹²⁷.

¹²⁴ Паустовский К. Наедине с осенью. – М., 1967. – С. 52. Цит. по: Петелин В. *Жизнь Булгакова. Дописать раньше, чем умереть*. – С.580.

¹²⁵ Беловинский Л. В.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ой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 М.: Высш. шк., 2008. – С. 4.

¹²⁶ Там же.

¹²⁷ Там же. – С. 6.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бъек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стоящей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ой работе –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го контекста роман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обсуждение 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руппе «МАССОЛИТ» как отражении менталитет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и, наконец жилищная вопрос как генератор поведения персонажей, который отражает обыденную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их людей 1930-х гг.

Целью работы является выяснение жизненн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эпохи, свидетелем которой был сам М. Булгков.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вышеуказанной цели в нашей работе ставятся и реша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дачи:

1. Проследить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явления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отраженные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М. Булгакова.

2. Проследить развит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как культурный феномен, и картину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жизни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И также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образ литераторов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3. На основе квартирного вопроса в «Мастере и Маргарите» выявить систему жилья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 её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 психику и поведение коллектива.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целями и задача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е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сь имманентный,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ый и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й анализ.

Имманентный анализ базируется на наблюдениях в тексте сюжета, диалога, статьи и описания поведения персонажи. Последить символ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о конкретной сцене, декорации и мебели. На основе сюжет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аспекты поведения 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татуса персонаже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Биография и личность писателя накладывают отпечаток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косвенно отражают мысль и жизнь писателя.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о применение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отраженной в романе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поскольку в описании обыденной жизни персонажей в большой степени воплощается и образ жизн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 Булгакова. А те проблемы, с которыми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герой Мастер, волнуют также самого писателя.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й анализ. Важнейше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считается «быт». И. Шайтанов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проблема быта должн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как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е этот метод применяется с целью выявления сходных черт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Автор настоящей работы пытаетс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роман М. Булгаков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и, которая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вызывает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не только в историков, социологов, но и у культуролого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ов.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ы автор старается соедини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культур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и также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М. Булгакова,

чтобы создать новую картину в булгаковедении. В этот состоит и **научная новизна** диссертации.

Структура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Диссертация состоит из введения, трёх глав, заключения и списк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Основ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работы

Во введение обоснована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темы, обозначены цели и конкретные задачи данной работы, изложены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писана структура, изложено кратк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глав.

Первая глава – **Писатель и его эпоха.** В этой части раскрываются социальн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1917 года, развит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1920-1930-ые годы.

Первый параграф: Социальна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20-1930-ые годы. В России сильно изменилис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условия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Ухудшение жизни людей позволила ей стать объекто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Е. Замятина, Б. Пильняка, М. Зощенко мы видим такие жизненные картины. После создания СССР,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установило новую систему, чтобы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жизнь и душу народа. Кроме того, у писателей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без поддержек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были преследованы.

Второй параграф: Жизнь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е Булгакова. В детстве

семей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мысли родителей оказали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будущего писателя. Окончив медицин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М. Булгаков работал над лечением простого народа, как А. Чехов. В 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он стал военным врачом. Медицинские опыты и проникательное наблюдение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ему записать все события. Дом, город и домашний очаг являются центральными темам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Булгакова. В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царят ироничный и фатаст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ы.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ирония М. Булгакова считалась властью посмешкой над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его творчество было запрещено печатать. Поэто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исателя было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лишь после его смерти.

Вторая глава – **Анализ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руппы «МАССОЛИТ» в «Мастере и Маргарите».** Она состоит из трех параграфов, основ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которых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анализе начала, развития и конца феноме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в России. С помощью обзорного изложен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МАССОЛИТ» как зеркал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жизни в 1930-е годы. А образ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их «литераторов» служит также предмет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анной главе.

Первый параграф: Развит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руппы в Росс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кружки, общества, салоны играют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и культурной жизни России в течение многи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Например, в 19-ом веке «Беседа любителей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 «Арзамас» и «Зелёная лампа»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ым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и группами играли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роль в развит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и также и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о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называют также «серебряным веком») наступил расцвет

русских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групп. Кроме символизма, акмеизма и футур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появились еще имажинизм и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и авангардизма. Однако в конце 1920-ого года был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изменение в связи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причинами: чтобы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идеологию, 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 запрещает всяк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любых групп.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счезали свободны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кружки и группы. Вместо них появились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группы, такие, как «РАПП» и затем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Второй параграф: Модель поведения и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сознание членов группы «МАССОЛИТ». Ключ к пониманию модели поведения членов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образа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членов «МАССОЛИТа» и окружающего их предметного мира. В-первых, уже в начале романа чувствуется «атеизм» Берлиоза и колебание Ивана Бездомного в вере. Скептическое отношении Берлиоза приводит смерть, а свидетелем события Ивану никто из «МАССОЛИТа» не верит, и его даже отправили в «желтый дом». Реакция членов на приезд Воланда и его свиста и меры, которые они принял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воевать квартиру покойного Берлиоза и их поступки определяют и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сознание советских литераторов. Кроме того, жизнь членов «МАССОЛИТа» и роскошность в ресторане Дома Грибоедова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жизни народа без членства. В изображении жизни членов «МАССОЛИТа», и образ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также и в авторском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и слышится ирония самого М. Булгакова. Недаром устами Коворьева он пишет, что группа «МАССОЛИТ» задушит мышление свободы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духа писателей.

Третий параграф: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 конфликте между группой и личностью – о судьбе Мастера. Конфликт «МАССОЛИТа» и Мастера возникал из-за власти.

Поскольку «МАССОЛИТ»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властью, и это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МАССОЛИТу» становиться мощным механизмом, у которого привилегия 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культурную жизнь. А Мастер, преданный свободе творчества, написал роман о Пилате и Иешуа, но из-за эт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его объявили сумасшедшим и посадили в психиатрическую клинику. Однако победа группы не обозначает окончательную. С появлением в Москве «необычного дьявола» Воланда жизнь москвичей 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жизнь членов «МАССОЛИТа» попала в тупик. И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с помощью Маргариты, которая согласилась быть королевой на сатанском балу, Мастер был освобожден и получил «вечный покой».

Третья глав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Квартирный вопрос как зеркало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1930-х гг.**». После осн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крестьяне приехали в города, чтобы найт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учить лучшие работы. Борьба за жильё стала одной из граней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А сам автор романа М. Булгаков, приехав в Москву, также столкнулся с этим вопросом. Поэтому квартирный вопрос не только являлся существенн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в Москве в 1920-1930-ые годы., но и стал объектом описания М. Булгакова в своем роман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я образ город как один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знаков в культуре, русский семиотик Ю. Лотман выделяет два наиболее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моду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города с окружающим его миром. Он пишет: «Он (город – И.Ч. Лю)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 только изоморфен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но и олицетворять его, быть им в некотором идеальном смысле (так, Рим-город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и Рим-мир), но он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его антитезой. Urbis и Orbis terrarum могут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ся как

две враждебные сущности»¹²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город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ученог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мифологемой. Та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применяется и в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романа М. Булгакова. Как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замечает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творчества Булгакова Е.А. Яблоков: «Тенденция к мифологизация город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связана у Булгакова с общим качеством «сценографичности» изображаем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пейзаж обретает черты «интерьера», декорации»¹²⁹, а в «Мастере и Маргарите» подобная функция с Триумфальной площадью, где Воланд показал вместе со своим свистом москвичам фокус.

В качестве антитезы города выступает образ дома. Однако дом для людей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е только символизирует очаг, но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борьбы. Этим образом писатель пользуется как средством изображения реальности своего времени.

Первый параграф: Квартирный вопрос в Москве 1920-1930-ых годов. Люди переехали в столицу после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 Однако в городе не достаточ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чтобы поместить стольких жителей, поэтому начали строить коммунальные квартиры (коммуналка), в которых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живёт несколько семей. Так формируется особы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специфического быта. В повести «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 романе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наиболее остро описывается такой быт. В этом параграф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именно этот аспект.

Второй параграф: Дом и город – культур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и

¹²⁸ Лотман Ю. Символика Петербурга и проблемы семиотики города // Лотман Ю. *Избр. статьи: В 3 т.* – Т. 2. – Таллинн, 1992. – С. 9.

¹²⁹ Яблоков Е.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Михаила Булгакова.* –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1. – С. 188.

частной области в «Мастере и Маргарите». В Москве 1920-1930-ых годов, в связи с недостатками у народа жилищ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еределали квартиры дворян и купцов в коммуналки. В таких жилищ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стирается границ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и частной области. В коммуналках люди будто подсматривают, как соседи живут. И чтобы получить больше жилищ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они следили друг за другом и сделали доносы. Поэтому часто бывало, что люди исчезают. Такое явление выделяется и в «Мастере и Маргарите».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писатель указывает ещё одну специфику быта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онтраст жизни богатых и бедных. В романе простые люди жили в коммуналке, а члены «МАССОЛИТА» или важные особы (как муж Маргариты), наоборот, в роскошных домах. Дом Грибоедова, дом Драмлита и другие зда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ебя именн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привилег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власти; простые люди же проживают в тесных и грязных коммуналках; а таланты, которые не приемлемы обществом (или точнее, властью) объявляют ненормальными и отправляют в психиатрическую клинику.

В **заключении** подводятся общие итоги проведе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дела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выводы:

1. В своей итоговой книге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М. Булгаков пользуется двойной сюжетной линией, приемом «роман в романе», сочетая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начало с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чтобы выдвигать такие вечные темы, как любовь, оппозиция добра и зла, света и тьмы, верности и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Однако под воображаемым миром романа мы видим и картины реального мира, проблемы которого сильно беспокоят самого писателя. Среди этих проблем

наиболее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и для М. Булгакова являются проблема свобод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и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2. Поскольку в 1930-е годы перестали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свободны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кружк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группы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осят сильные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тенки. В роман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такой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является «МАССОЛИТ». Члены этого кружка обладают особым способом мышлением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 типом поведения.

3. Квартирный вопрос существенен для жителей Москвы 1930-х гг. Он и изображается в «Мастере и Маргарите». Борьба з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стала одним из главных занятий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В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стоят дом Грибоедова и дом Драмлит, образ жизни жителей которых си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жителей коммуналок.